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 亨 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413 期

2024 年 12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一道同风：左宗棠湘军集团西北善后的文治教化 杨红伟、董 玫

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认知与争论 王 娟

中国藏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间探索与实践 李 健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65 期

这里不是芝加哥：后灵魂时代南方的种族、阶级与区域身份 Zandria Robinson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66 期

新俄罗斯民族主义：2000-2015 年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 Pål Kolstø,
Helge Blakkisrud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一道同风：左宗棠湘军集团西北善后的文治教化¹

杨红伟、董玫²

摘要：左宗棠及其湘军集团在平定陕甘事变与收抚新疆的过程中，为重建西北社会秩序，实施了一系列文治教化措施。左宗棠以程朱理学为圭臬，期以塑造共同价值体系，实现边疆与内地“一道同风”，从而奠定西北长治久安基础。湘军集团部属周汉所撰《教民歌》采用七言格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较为集中表达了崇礼教、睦回汉的思想主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左宗棠“治民则以王道行之”的为政之道。《教民歌》蕴涵其间的则是湘军集团为代表的理学文治教化的价值与目标取向。

关键词：左宗棠；湘军集团；西北善后；睦汉回；一道同风

陕甘事变后的善后工作，是以同治中兴名臣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集团³重建西北社会秩序的努力，为左宗棠与近代西北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陕甘善后的研究，可概分为恢复生产说⁴、扼制发展说⁵、化解矛盾说⁶、民本思想实践说⁷。但总的来说，重建社会秩序，即将社会从失序状态导向有序，固然包括对各种越轨行为的惩罚，对大众的安抚，对矛盾冲突

¹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1期，第195-205页。

² 作者：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董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³ 左宗棠湘军与曾国藩湘军虽同根同源，但有区别：其一，前者之“湘”泛指湘地，其兵源包括湖南省全境，也称“楚军”（取湖南之意）；后者的兵源主要来自湖南湘乡一县。其二，建制方面，“楚军”以王鑫创建的“老湘军”作为基础不断扩充，其统帅多行伍出身。统领兼任营官，直接参与管理士兵，因而部队的战斗力更强，内部组织关系更严密；曾国藩湘军统领多启用文人。

⁴ 相关研究观点，如王林强调：“陕甘回民起义的原因极其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存问题，此问题若不解决，单纯的军事上胜利不会维持长久。左宗棠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及时进行善后工作，将大批回民安插各地，尽快恢复生产（王林：《左宗棠》，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0页）；杨东梁认为左宗棠在西北的善后举措固然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杨东梁：《左宗棠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⁵ 相关观点，如马志荣认为，左宗棠为图清封建统治者的“百十年之安”采取了一整套孤立、削弱、限制回族群众的善后措施，其目的是“涣其群，孤其势”，阻碍扼杀回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马志荣：《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方略及善后措施述评》，《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8-14页）；马啸石认为，甘青宁行政建制的划分意在加深回汉之间的隔离和对立情绪，移民政策是为了对回族群众进行隔离和惩罚（马啸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东方书社1950年，第76-78页）；杜经国、张克非认为，左宗棠西北善后应该分开评价，对陕甘回族推行的隔离、限制和削弱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回族以经商为传统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破坏了回族经济的内部结构；而收复新疆后的善后则与前者判若云泥，意在维护祖国统一（杜经国、张克非：《左宗棠在陕甘与新疆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1-7页）。

⁶ 相关观点，如杨卫东认为，左宗棠“徙戎”之举是基于西北事实的“权宜之计”，不能简单理解为“涣其群，孤其势”，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稳定了地方秩序（杨卫东：《关于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族起义及善后措施的再探讨》，《松辽学刊》2002年第12期，第22页）；赵维玺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推行以“防范、隔离、民族同化”为主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北社会稳定，但同时阻碍了西北回族的发展（赵维玺：《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24-29页）。

⁷ 如安静波认为，左宗棠的行为基于“忠君”“重民”的原则，着力恢复西北秩序，为民本思想增添了新内涵，但其镇压民族起义的行为仍有时代的局限性，因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统治土壤培育不出近代意义的民本思想（安静波：《左宗棠与民本思想》，《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63页）。

双方的隔离,更为重要的则是社会价值及其行为规范的重建——王朝国家政治文化与核心价值的再社会化,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社会行动,从而使社会在人们行为的“就范”中因可预期而走向有序。换言之,就是实现文治教化。¹对左宗棠善后工作的评价,绝不能仅局限于“霸才”的一面,更要看到其“王道”的一面,方能克服对历史认识的单一化、平面化与碎片化。此正如《清史稿》评价左宗棠“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綏,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²。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教民歌》向来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然其却可以补充和丰富左宗棠湘军集团在陕甘善后中所呈现的“王道”面相,由此可窥见左宗棠湘军集团重建西北社会秩序的文治教化。

一、左宗棠“崇正学、同华风”的文治教化观

晚清湖湘文化上崇程朱理学,下求经世致用之策,故其为政多有所本。左宗棠强调“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³。又言:“至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⁴而其所本,即程朱理学,此即光绪四年左宗棠告子书所言:“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盖自度陇以来未有改也。”⁵“理”构成了朱熹学说的本体论,被视为是先验存在的自然规律,“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⁶。人与万物皆本理缘气而生,气清浊不同资质有别,但均有善因,蕴含仁义礼智的种子。惟能向学,“穷理、知至,直是下功夫消磨恶去,善自然渐次可复”⁷,返回至仁义礼智。

左宗棠生长在崇尚程朱理学的湖湘文化的浓厚氛围之中,处处受之熏陶。左宗棠治学以“以程、朱为准的”,强调“伟人大抵依传注以释经旨,宗程、朱以探原孔、孟,阶级可寻,涂辙自合”。⁸因而,在“儒术策治安”⁹的前提下,左宗棠强调嘉道以来天下乱象,都是由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的结果。他强调“天下之乱,先乱是非”¹⁰,正统学说受到冲击,异端思想泛滥,导致社会价值规范紊乱,进而导致社会失序。如历史上的黄巾之乱、五斗米之祸,韩山童、刘福通起事,“斯故天子启明,亦由时之失教”,而“异端之起,往往假幻渺之说以疑人;邪慝之兴,又往往窃异端之绪以立教”。¹¹乾隆中期以后,汉学兴起,动辄疑古,破坏了儒家学术的权威性,“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

¹ 文治教化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天下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是将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潜移默化地培养民众礼法习俗和道德情操,塑造民众心灵品性,以达到人伦秩序和谐、社会平安安定的目的。

这里指左宗棠通过各种治理措施和手段将儒教文化典制和礼法人伦等规训西北汉回民众,重塑造民众人伦道德,重整社会秩序、实现西北地区的和谐安定。

²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35页。

³ 左宗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1页。

⁴ 左宗棠:《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0页。

⁵ 左宗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41页。

⁶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⁷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⁸ 左宗棠:《南菁书院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60页。

⁹ 左宗棠:《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406页。

¹⁰ 左宗棠:《与王子寿》,《左宗棠全集·书信 1》,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54页。

¹¹ 左宗棠:《会试文·戊戌科第三场第五问》,《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96页。

儒先为能，放言无忌，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¹；西方宗教的传播，也破坏了中华声教，至利玛窦、汤若望传播天主教，“斯又异端之无赖，左道之最愚者矣”²。左宗棠强调：“夫学术与世运为升降，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由之而明，休祥瑞应由之而出，非细故也。”³因而，要重建社会秩序，就要先正学术，消除异端，推行教育，正人心，厚风俗。

左宗棠在重建西北社会秩序时，即按照以程朱理学为正学的理路，大兴文教事业，诸如刊刻儒家经籍、兴办书院、推行义学、奏请陕甘分闈、建立忠义祠等。⁴这些措施，既有一脉相承性，也有根据西北区域社会的实情所加的变通与更为详尽的发挥。

首先，左宗棠期望通过振兴西北文治教化之事业，建立起符合程朱理学的社会价值核心，重建西北社会秩序。他在西北大量刊刻儒家经籍，种类极多，然所偏重的内容，多与程朱理学有关。此亦与左宗棠强调程朱理学的“世范”功能有关。早在同治三年，左宗棠在《马征君遗集序》中，即高度推崇程朱理学对皖中儒者抵抗太平军正面影响：

独皖中诸君子犹能谨守朱子家法，若桐城之姚惜抱、方植之，贵池之桂丹盟皆有述焉。方粤寇彼猖时，徽州助饷杀贼为数甚巨，如婺源，如泾县，如庐州，如桐城，如宣城之金保圩、当涂之二十一村，人自联结，与贼鏖斗，播格数年，仗义死节之士不可胜纪，其非朱子之教泽长而诸儒守正之功大欤！⁵

故，左宗棠津津乐道者，则有《六经》《小学》《吾学录》《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等。左宗棠刊刻鲍廷康本《六经》⁶始自同治三年，西征后又先后在武汉、关中等地刊印。左宗棠期望通过《六经》的刊刻与发行，为关中之学延续一线生机，改变西北地区文化落后的根本面貌，奠定西北地区长治久安的基础，即“以《六经》导之，冀蚩蚩者有几句圣贤话时在口头，亦当有益也。人不悦学，閔予焉知周之将亡？治乱剥复之机实系乎此”⁷。《小学》由宋儒朱熹发起，共6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分为立教、明伦、敬身、鉴古，外篇为嘉言、善行，中心思想在明人伦，辨明仁义礼智。左宗棠将《小学》作为人生的基本功，列入义学条规：“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⁸左宗棠重刊《吾学录》，盖因“入关度陇，经理新疆，驻节边塞，目见蚩蚩之氓失教已久，习俗相沿，不知大经大法为何事”，“戎事甫毕，圣化维新。读法而外，学礼宜急”，“爰检《吾学录》所订昏礼、祭礼、丧礼，列为上下卷，颁行各塾，

¹ 左宗棠：《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22 页。

² 左宗棠：《会试文·戊戌科第三场第五问》，《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396 页。

³ 左宗棠：《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22 页。

⁴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 1984 年，第 253-268 页；赵维玺：《湘军集团与西北回民大起义之善后研究：以甘宁青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第 174-246 页。

⁵ 左宗棠：《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22 页。

⁶ 鲍本《六经》，因《乐记》包括在《礼记》中，实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经》。左公言：“鲍氏刊本，即前浙江所刊旧式而又重加附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参见《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63 页）。

⁷ 左宗棠：《翁潘司同爵票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62 页。

⁸ 左宗棠：《平凉县王令启春稟设义学条规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52-523 页。

俾为新民，共沾圣泽”，“意者化民成俗”。¹

《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即康熙帝所做《圣谕十六条》的通俗读本，并将《大清律例》的相关内容附入。《圣谕十六条》的基本内容为：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讐忿以重身命。²

颁行各州县，各于城内设立乡约，朔望宣讲。雍正初年，对“十六条逐条注释，敷广六七百言，约计共有万言，名曰圣谕广训”³，颁行各州县。雍正七年，又令各州县在乡村“宣读圣谕广训，阐明大义，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咸生孝友敦睦之思”⁴。为了便于宣讲，各地衍生出各种通俗读本。《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为已故内阁中书、安徽颍州府教授夏忻所编。左宗棠极为欣赏夏忻学识，故督闽浙时“曾刊发夏忻所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广为传布。移督陕甘，复重刊之”⁵，盖以其书“义蕴精深，词旨易晓，而大经大法，毕具于此”，希冀借此“圣化覃敷之义。长治久安，或基于此”⁶。这个版本也是周汉所乐道的版本。

其次，辨学之正邪，主张“黜异端以崇正学”，使文教事业纳入到程朱理学的正途，以奠定西北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左宗棠强调“戡乱虽在武功，而邅治必先文德”⁷，将以文化民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反之，“关陇兵燹之余，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但兴教劝学必先正学，盖因“经正民兴，一定之理”。⁸为此，左宗棠特作《黜异端以崇正学示》，指出：“何谓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正学之外，即“凡异乎圣贤之教而别为一端者”则是异端。道教、佛教“虽与圣人之教判然如水火之异性，黑白之异色，然谈因果，说祸福，尚有教人去恶为善的意思”，尚有可取之处；而其他异端，如白莲、闻香、无生等会，必须加以屏黜。“正学”即为儒教，而儒教以程朱为正统。左宗棠并引《大清律例》言信邪教、从邪教的危害，劝民“坚守中国圣人之教，不生妄想，不作非为，长享太平之福，不至为刑戮之民”；借道光帝《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之意，劝“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⁹

再次，左宗棠主张通过“变其旧俗同我华风”¹⁰的方式，确立程朱理学在西北区域社会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奠定西北长治久安的基础。左宗棠对西北地区的文化存在着深深的忧患

¹ 左宗棠：《重刊吾学录序》，《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30-231 页。

² 《康熙朝实录》卷 34，“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清实录》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461 页。

³ 鄂尔泰等编《朱批谕旨》第 11 册，上海点石斋光绪丁亥刊本，第 8 页。

⁴ 鄂尔泰等编《朱批谕旨》第 19 册，上海点石斋光绪丁亥刊本，第 37 页。

⁵ 左宗棠：《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恳宣付史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7》，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72 页。

⁶ 左宗棠：《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6 页。

⁷ 左宗棠：《请旨颁发甘省各属书籍条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7》，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64 页。

⁸ 左宗棠：《翁藩司同爵呈贡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59 页。

⁹ 左宗棠：《黜异端以崇正学示》，《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87-588 页。

¹⁰ 左宗棠：《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6 页。

意识，“盖自周初王迹以次东指，两千余年，不沾圣化，陇右沦于戎狄，遂致别为风气耳”¹，尤其是甘肃“南北界连藩服荒服，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左宗棠希望通过推行儒学教育，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更以“力求坊民正俗之道”为急务，实现“彝伦攸叙，民兴于行”。² 故其期望，西北各地官员能够将《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朔望宣讲，令汉、回士民有所遵守”³，“以广教化而顺舆情，庶皇仁远被，殊俗同风”⁴。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他强调“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在新疆南北两路，刊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杂字》《孝经》《小学》等书籍，兴建义塾 37 处讲授《诗经》《论》《孟》等课程，并以“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与“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而自矜“秉彝之良，无中外可分，欲善则善，理有固然，虽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已可睹也”。⁵

最后，左宗棠重视宣传作用和传播手段，认为只要能够讲明“礼义廉耻数字”，就可以使民众“革其旧染之污”，通过“随事指示，随时申做，庶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可期俗易风移之效也”。⁶ 早在同治四年，左宗棠即鉴于福建“自昔所称邹、鲁之乡，渐沦为蛮夷之俗矣”，颁布《谕闽六禁》，“庶几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仍为盛世良民，以渐复海滨邹、鲁之旧”。⁷ 他也试图借助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体，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如同治八年左宗棠做《禁种罌粟四字谕》，劝谕民众罌粟传播实乃“外洋奸谋”，“恶卉繁滋，废我嘉谷”不仅会导致“可衣无棉，可食无肉，盍可无粮，栈可无豆”，还败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风美俗，陷人民于“唯腥是闻，唯臭是逐。农辍耒耜，士休卷轴，工商游嬉，男妇瑟缩”的危险境地，呼吁农民铲除罌粟，广种粮蔬，“锄种壅溉，饔飧可续”。⁸

左宗棠既是其湘军集团的统帅，也是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和西北善后与秩序重建的总设计师。尤其是在文治教化政策上，左宗棠尊崇程朱理学，既是其湘军集团成员一般的思想范式，而左宗棠由此而制定的文治教化之战略，更是其湘军集团成员实施政策的基本参照。如周汉仿《圣谕十六条》阐述其旨趣，并针对西北的具体情形略加变通与增益，并能受到湘军集团其他成员的认可，根源即在于各种规训内容和方式不脱左宗棠重建西北社会秩序的文治教化基本范畴。

二、安回汉、道同风与左宗棠善后政策

左宗棠深受朱熹“理”“气”学说的影响，曾言：“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⁹ 这就使左宗棠在人性上不存偏见，皆能以性本善而视之。他从

¹ 左宗棠：《与谭文卿》，《左宗棠全集·书信 2》，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339 页。

² 左宗棠：《文县陶令模稟捐设恤嫠经费规条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84 页。

³ 左宗棠：《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6 页。

⁴ 左宗棠：《恳恩添设化平川学额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6》，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39 页。

⁵ 左宗棠：《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7》，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466-467 页。

⁶ 左宗棠：《狄道州喻牧光容稟举办地方各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387 页。

⁷ 左宗棠：《谕闽六禁》，《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67-569 页。

⁸ 左宗棠：《禁种罌粟四字谕》，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77 页。

⁹ 左宗棠：《会试文·乙未科第二场·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369 页。

“理”生万物的角度强调，人虽不能窥见造化之秘，万物亦各不同，然“天”却可以“并育万物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¹。因而，人与人之间，群与群之间，并无根本的冲突，不应因其各异而不相容。即使因“气”而别，“万物之各有其类也”，从天的角度来看，实则“厥类一也”，因而虽然存在“类不一则情私，私则争，争则害矣”的现实，只要能做到“有统其类而一之者，而后秩然各受其性命之正而不乱”，就可以实现“其不相害也，其并育也；其不悖也，其并行也”。² 人与圣本原，皆蕴仁义理智之至理，虽因气类相别相争，然施以政教，使其向学向善，缘气而返其仁义理智之本，统一于“理”，必可秩序井然，并育而生。这就构成了左宗棠善后与重建西北社会的哲学基础。

首先，左宗棠本“理”生人的理念，制定不分回汉、只问良匪的剿抚政策与公平公正的善后政策，以期回汉相安，奠定各民族和平相处的社会环境。这既与清朝“务宜不分回汉，但问顺逆”³的政策有关，也是左宗棠“同一世宙，同一生民”⁴的一贯思想。他认为陕甘回民起事源自于回汉仇杀，其责任并不全在回民，只是不应在不良回民的煽惑之下戕官戮民，挑战王朝的统治秩序。且“回民杂处中土，由来久矣。我朝二百余年以来，一视同仁，未尝区别”⁵，如果因为少数“逆回”就对回民“欲举其种而灭之，无此理，亦无此事”⁶。左宗棠强调，对回汉不应区别对待，平息战乱的关键则在于“分良匪不分汉回”⁷故而，左宗棠认为，从维持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必须坚持“除莠安良”相结合。早在咸丰五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左宗棠就指出：“官欲除莠安良，非令良与莠仇，从而助之，不得也。”⁸ 即便是针对其眼中的“逆回”，左宗棠也并非一味强用“剿”，而是“剿抚”结合，以“抚”为先。同治八年，左宗棠亲撰《谕汉回民示》四字谕示，劝之及早就抚，莫干兵锋：

汉、回仇杀，事起细微，汉既惨矣，回亦无归。帝曰：“汉、回，皆吾民也，匪人必诛，宥其良者。使者用兵，仁义节制，用剿用抚，何威何惠。告谕吾民，俾晓吾意，勿比匪人，以死为戏。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近扫郊甸，远征不庭！”⁹

左宗棠宣示“无专剿回民之意”，固然有使之“知覆载甚宏，必不协以谋我。将来锄其桀黠，策其善良，便可百年无事”¹⁰的考量，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亦给予其制度性保障，并严禁汉民循环报复：“良回及悔罪自新之回民来归后，各给予良民牌票，拊循安集，俾其得所，不准汉民欺凌。”¹¹ 在善后中，左宗棠则要求各级官员谨记“无论汉、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对待各族人民务必要“开诚抚治”，“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做到“心惟大公，无失之偏，无失之私；理本至正，无使强凌弱，毋使众暴寡”。¹²

其次，左宗棠本“气类有别”的思想，审慎制定善后政策，欲以安插之法，消弭回汉，

¹ 左宗棠：《会试文·戊戌科第一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382 页。

² 左宗棠：《会试文·戊戌科第一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382 页。

³ 《同治朝实录》卷 29，“同治元年五月丁未”，《清实录》第 45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789 页。

⁴ 左宗棠：《巩秦阶张道瑞珍稟办安抚汉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34 页。

⁵ 左宗棠：《谕回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71 页。

⁶ 左宗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24-125 页。

⁷ 左宗棠：《复陈查明刘松山各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4》，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72 页。

⁸ 左宗棠：《与王璞山书》，《左宗棠全集·书信 1》，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16 页。

⁹ 左宗棠：《谕汉回民示》，《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76 页。

¹⁰ 左宗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124-125 页。

¹¹ 左宗棠：《谕回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572 页。

¹² 左宗棠：《河州知州潘牧效苏稟拟办善后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99 页。

乃至回民与回民、回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寻仇滋事，再掀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左宗棠安插回民，固然有其涣散其势的考虑，但说到底还是源自其“万物之各有其类也”的思量。尚未入陕之前，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左宗棠业已指出：“回民自唐以来，杂处中国，蕃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¹他认为，回汉气类之别，不仅使双方在信仰与生活习惯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也是造成双方不和、导致冲突的根源：“回民既自别于汉，汉民遂亦外视乎回。由是耦居相猜，各分气类，争讼械斗，嫌衅积深，而仇杀之端遂起。”²进而认识到，处理陕甘事变与处理捻军大有不同，可以概括为二点：一是抚后解散之难，盖“发逆剃发，捻逆抛弃马械，即与平民无殊”，而回民“与汉民积仇既深，婚姻不同，气类各别，彼此相见，辄起杀机，断难乎洽。又种族攸分，状貌亦异，杂一回民于稠众中，令土人遍识，必能认别，百不一爽”³；二是安插之难，乃因“回众与汉民仇隙既深，必不能相安无事”⁴。

为了战后避免各民族间相互寻仇，再起衅端，左宗棠关于难民的安插是极为审慎的。对此，左宗棠曾指示：

抚局定章，除金积新教勒限迁徙，此外准河、湟本地回民就近安插，余皆概令迁徙，不准安插故土。盖当时两省各属回民业已从乱如归，与其乡邻寻仇构衅，汉民被其戕害戮辱，惨目伤心。此时若准其仍归旧业，汉民目睹旧仇复至，必不甘心，因而纠聚报复，滋生事端，官司防禁难周，势所必至。⁵

“迁徙安插”确有造成回民隔离的效果，但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迁徙安插并非专对回民，也包括汉民，即“顾谋迁徙必先定安插之地。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宜”；其二，迁徙安插回民，对回族群体自身的考量也是重要的方面，即所谓“不但陕回与甘回气攸分，即陕回与陕回、甘回与甘回，亦有难并域而居者”，故“即以回情而论，亦非分起安置不可”。⁶为杜绝纠葛的延续，左宗棠及其湘军集团竭力公平处置战争期间的财产纷争。如关于甘肃省西宁府循化厅保安堡藏族部落占有马家四房回民的财产问题，甘肃省布政使、按察使等就札飭循化厅“其四房马家仓回民数百家，地界番境，田房半卖番民，半被霸占，此时予归业，虑其彼此寻仇，反滋事故，拟请查出番民实在霸占回业，概令平价卖与番民，办妥后另行请示安插他处，以杜讼源，亦是办法。”⁷并发布《治安告示》，广为张贴，极力宣传：“地方平靖，各为良民，汉回番土，不准斗争。从前仇恨，解释和平。”⁸

复次，左宗棠认为无论汉回，抑或蒙藏等各民族，皆为朝廷赤子，均应对其实实施积极的国家治理，俾政教修明，实现“一道同风”与西北社会的长治久安。左宗棠认为人人皆可去浊气，通过格物致知，达于仁义礼智。而西北大乱的关键，则在于国家不能平等对待各民族，缺乏有效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故左宗棠对清朝“因俗而治”的西北边疆政策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周文、武以来，王迹日趋日东，遂视西极为荒裔禽兽之居，数千年未沾圣人之化，戎羌杂处，益以种人，其不能与十五国同风并治，亦固其所。然蚩蚩者，何非

¹ 左宗棠：《预陈剿抚回匪事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3》，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71页。

² 左宗棠：《谕回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71页。

³ 左宗棠：《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左宗棠全集·奏稿4》，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58-359页。

⁴ 左宗棠：《饷项将罄请催江南等省协饷并援案借用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3》，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00页。

⁵ 左宗棠：《河州潘牧效苏禀请准令回民迁归本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16页。

⁶ 左宗棠：《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60-261页。

⁷ 《为办理善后经费事》，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06-永久-15。

⁸ 《地方治安（告示）》，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06-永久-32。

人类？可鄙夷之耶？度陇以后，渐思效法古治，度可为者，见诸措施。¹通过强调人皆同心、同性，不可分别对待实施歧视政策，表明了自己欲仿效古治，进行改革的决心。

左宗棠改革西北现状的中心思想是“圣贤论政，既庶则思所以富之，既富则思所以教之”²，“夫欲庶民之兴行，必先正教之修明”³。关于生存问题、发展问题与教育问题，同治十年左宗棠曾有精彩之论述：“照得甘省久遭兵燹，遗黎仅存。本大臣爵督部堂安插、发赈，所以求庶之之道。然庶而不教，则日流于非，何以靖乱？教而不先之以富，则执衣食不足之民绳以礼法，为上者亦大不仁。”⁴从而在根本上指出了治乱的关键，而陕甘之乱与清朝国家政权建设的不足有着密切关系。如，金积堡距州城“百余里，鞭长莫及，地方官政令不行，其权遂移于回酋。于是回民畏其所管头目甚于畏官，此乱之所由生也”⁵；董志原“距安化、宁州、镇原各州县治所均八九十里及百余里，地方宽旷。因向未设官吏，故钱粮词讼，一切经理乏人，民多不便；且政教不行，奸宄易于藏匿，关系非小”⁶。左宗棠强调，欲图“久远之规，非添设县治、更易建置不可”⁷，如其建议改平凉同知为知县，并“于盐茶同知辖境迤西打拉池地方，添设县丞一员，划分界址，将所辖命盗、词讼、钱粮、赋役由县丞勘验征收，统归新升固原直隶州管辖，庶弹压抚绥，均可就近经理，而政教宣达，戎索秩然。边荒长治久安之方，无以逾此！”⁸

左宗棠对清朝前期的新疆文治教化政策，同样持批评态度，力主新疆改置行省。他认为新疆最大的问题，在于“北路得之准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久已概为边地”，既有的军府体制下，“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⁹这不仅造成官民相隔，官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歧视，作福作威，任意苛索，还导致“新疆地方因俗施治、政教未行，愚回信奉其汗比条勒，已成锢习”¹⁰。左宗棠建议清朝在新疆建行省，设郡县，举凡建义塾、广屯垦、开水利、课蚕桑，“诚得亲民之官实力任事，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为门户、堂奥之图，视为自家性命之事，还定安集，生聚教训，有弊必去，有利必兴，宽以岁月，而谓其终不能与中原同风并治者，断无是理”¹¹。他相信：新疆“素多腴区，若次第经理，开置郡县，养之教之，不难与内地同风并治，非但疆索巩固，俄、英诸强邻不敢妄肆鸱张，并可为国家货省经费无数。”¹²

¹ 左宗棠：《答曹镜初部郎》，《左宗棠全集·书信2》，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78页。

² 左宗棠：《狄道州喻牧光容禀举地方各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87页。

³ 左宗棠：《会试文·戊戌科第三场第五问》，《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97页。

⁴ 左宗棠：《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20页。

⁵ 左宗棠：《筹办金积堡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07页。

⁶ 左宗棠：《会勘董志原地方拟设县丞驻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45-246页。

⁷ 左宗棠：《升固原州为直隶州添设下马关 知县并改盐茶厅同知为知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421页。

⁸ 左宗棠：《升固原州为直隶州添设下马关 知县并改盐茶厅同知为知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5》，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422页。

⁹ 左宗棠：《复陈新疆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7》，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73-174页。

¹⁰ 左宗棠：《逆酋窥边官军防剿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7》，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51页。

¹¹ 左宗棠：《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8》，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35-136页。

¹² 左宗棠：《与何小宋制军》，《左宗棠全集·书信3》，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367页。

左宗棠辑睦回汉的政策，表现出其“视民如伤”的民本思想与经世致用的务实性，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这就使左宗棠能够宏观谋划与切实推行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各种政策，寄希望政教修明，实现各民族教养的全民提升，并将西北社会的稳固与边防安全的强化奠基于此。

三、崇礼教、睦汉回与《教民歌》

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构建，既重“礼”亦重“乐”，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礼教”作为价值核心，而以“乐”作为“声音之道，以为中和之气，所以格天人而和上下”¹。以乐演礼，以乐济礼，乃是传统中国，尤其是“亲民之官”针对识字率较低的乡村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由此演化为以劝民歌、劝戒歌、教民歌等为题目的类型繁多的“教民歌”。现存各版本的教民歌，内容大致相同，“本经术以敷政教”²，以宣扬忠义孝悌、鼓励民众勤勉耕读、恪守礼义为主；形式上多采用七言格律，“词意详明，可讽可歌”³；语言表达上，“文理显豁了当，乡愚都解，极能感动民心，整顿风俗”⁴。其差异之处，在于教民歌多为亲民之官所撰写或提倡，故其在本礼教为核心的基础上，多有根据各地之风俗、社情的实际而讽劝的内容。如雍正十三年夏津县令方学成所做《教民歌》，包括教民孝、教民悌、教民忠、教民信、教民礼、教民义、教民廉、教民耻等八项内容⁵；道光元年，山西长子县令丁文钊所撰《劝戒歌》则包括要孝弟、要诵读、要力作、要树木、要教子、要守分、要睦族、要和邻、要行善等“九劝”与为勿抗粮、勿健讼、勿唆讼、勿诬赖、勿争斗、勿习匪、勿诬骗、勿嫖赌、勿奢侈等“九戒”⁶；道光二十七年浙江玉环厅同知徐荣“演教民歌刊示，分为忠、孝、勤、俭、让五首”⁷。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光绪甲申仲春重刊、甘肃秦州署藏板《教民歌》⁸既有一般教民歌的共性，也有与其时代特征、地域社会社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关于此《教民歌》的由来及其刊布情况，据其序：

岁辛未，余权篆静宁。明年，湘阴相国平定河湟，奉檄安插回民。适友人周铁真观察过静，为作教民歌十条，言浅意深，感人最易。当付手民刊布，驯致汉回辑睦，识者尚之。兹余忝领郡符，抚绥乏术，用重刊此歌，以当告诫，亦聊以遣尸位之谓云。寄湘渔父识。

按：寄湘渔父，即余泽春，字二田，因早年寄籍湖南号寄湘渔父，浙江遂安人，“于咸丰九年投效军营，随同前四川督臣骆秉章援川”，同治二年“随同湘果军援陕”，同治十年（辛未）经左宗棠“委署静宁州知州”，“办理一切，诸臻妥协，且于甘省关内外地方情形最为熟悉”。

¹ 毛奇龄：《圣谕乐本解说》卷1，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198页。

² 梁大鲲：《邑侯方松台明府告示歌序》，载孟昭贵主编《夏津县志 古本集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9页。

³ 何耿绳：《学治一得编》，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93页。

⁴ 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8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2页。

⁵ 方学成：《送华堂集》，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4-665页。

⁶ 何耿绳：《学治一得编》，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693-694页。

⁷ 杜冠英、胥寿荣主修，吕鸿焘总纂《玉环厅志》第9卷，光绪六年玉环厅署板，第13页。

⁸ 周汉：《教民歌》，光绪甲申仲春重刊，甘肃秦州署藏板。

¹其后，先后任署平凉县知县、敦煌县知县、皋兰县知县、秦州直隶州知州、甘州府知府等。同治十年（1871），余泽春署静宁州知州。次年，周铁真路过静宁，为之撰写《教民歌》。余泽春任秦州直隶州知州内，于光绪十年（1884）重新刊刻，并予以推广：“嗣后因公巡历乡村，遇有孩童能唱此歌者，给予奖赏。嗣后月课，凡生童有能默写此歌，不错一字者，格外优奖。”故，甘肃秦州署藏板《教民歌》，乃周铁真撰写于同治十一年，又可称之为周铁真《教民歌》。

周铁真《教民歌》采用七言歌谣体，共分十条内容。起首，周铁真借天道报应的思想，强调“凡人个个要学好”，否则必定导致上天报应，“惹得天公降劫来，到处死多生者少”，并号召家家户户人人传唱，“无事家中唱着唱，唱与合家为榜样。老的教与幼的知，夫教其妻父教儿”。其内容分为敦孝悌、勤读书、守妇德、勤树艺、莫争讼、莫嫖娼、莫从邪、学简朴、回汉和睦、早完粮十条。每条内容，首句提出主张，其后数言，则或阐述如何做，或分析其道理，或详述其危害，或要言其利益。如，“一教尔民敦孝弟”，强调“为人首从孝弟起”，重在阐述如何孝敬父母与兄弟敦睦；“二教尔民勤读书”，讲读书的好处，“人能读书自明理”与“学问精通品行优”；“三教妇人守规矩”，教妇女三从四德与勤俭持家；“四教尔民勤树艺”，劝民垦殖，努力生产；“五教尔民莫争讼”，教民遇事忍让，平安是福；“六教尔民莫嫖赌”，以免“荡产倾家身受苦”；“七教尔民莫从邪”，告诫民众“信他诱惑入他门，将来受害决非轻”；“八教尔民学俭朴”，莫要奢侈、浪费、摆阔气，富时要记穷时苦；“九教汉回要和睦”，劝告汉回要一笑泯恩仇，切莫再互相仇杀，否则就是“汉业吃亏回也苦，性命都如鱼入釜”；“十教尔民早完粮”，否则既要受差役催科之苦，又要受王法的究办。最后，回应歌首，呼吁民众“及早学好人”，对歌的内容“家家唱熟个个从，千祥万福喜融融”。

无独有偶，民国《榆林县志》卷45《艺文志·杂文》亦载《教民歌》²一首。其内容，除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外，与周铁真版近乎无异。考其作者，原本仅作“前人”，《榆阳文库》编纂委员会点校时，注“前人”为刘厚基。刘厚基（1840-1877），字子埜，号福堂，湖南耒阳人。咸丰军兴，投湘果营前锋，从征楚蜀，累著奇功。同治六年，随左宗棠从征陕西。同治七年，任延绥镇总兵。在任期间，刘厚基“殫力经营，抚恤残黎，开垦荒地，修筑城垣，开浚榆河，建祠庙，修书院，捐膏火，设义塾，凡地方义举，无不尽力经营；一切工作，均亲督兵勇为之，以纾民力；严密布置烽埃，绝少疏虞；联络鄂尔多斯诸旗，藩篱益臻巩固。任事九年，蒙、汉相安，兵民和辑，成效可睹”³。故其颇得左宗棠之赏识，被誉为“实武职中不可多得之员”⁴。盖其在任期间，不仅兴民生，苏民困，尤重视文教事业，民国《榆林县志》称：“复于整军之暇，雅意兴文，如设义塾，造惜字炉，刊教民歌，犹浅近事。惟修书院，捐膏火，择俊秀子弟，延名师，馆署内训课之，遇乡试优给宾兴。为会试计，重修葺北京榆林会馆。培养文风，不遗余力。”⁵惟其关于教民歌之述，用“刊”而不用“撰”或“作”等，概言其转刊之可能。加之，周铁真、余泽春与刘厚基同属老湘军⁶集团，亦又可

¹ 左宗棠：《请以余泽春补授敦煌县知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65页。

² 裘世廉、贾路云监修，张立德等纂修《榆阳文库·榆林县志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5-508页。

³ 左宗棠：《延绥镇总兵刘厚基病故请恤片》，《左宗棠全集·奏稿6》，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55页。

⁴ 左宗棠：《延绥镇总兵刘厚基因病出缺请以谭仁芳接署折》，《左宗棠全集·奏稿6》，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554页。

⁵ 裘世廉、贾路云监修，张立德等纂修《榆阳文库·榆林县志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

⁶ 湘军创建者江忠源，所率楚勇于道光咸丰年间驰援皖等处。咸丰二年，太平军破湘入道州，王鑫与罗泽南束伍选士，请练民兵，湘勇自此始。王鑫起初深得曾国藩赏识，曾称赞他是“刘琨、祖逖之徒也。”后二人间生嫌隙，王鑫愤而率军脱离曾国藩湘军，自号“老湘军”，也称“老湘营”。王鑫治军好整以暇，军纪严明，素喜为兵士“陈说大义”。王鑫病逝之后，“老湘军”由刘锦棠统领，在平捻、平回、收复新疆

能互通声气。由此推断，民国《榆林县志》所载《教民歌》与甘肃秦州署藏板《教民歌》应属周铁真同治十一年所做《教民歌》的不同版本，故在两刻本中存在个别出入之处。

周铁真《教民歌》能受到左宗棠湘军集团内部的重视，甚至被反复刊印，概因其除有一般教民歌尊礼重法、劝民生养的共性外，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区域社会色彩与明确的问题针对性。其一为第七教，全文为：“七教尔民莫从邪，邪教哄你莫信他。哥老会匪是盗贼，天主教匪是妖孽。劫杀奸淫无不为，三纲五常都灭绝。信他诱惑入他门，将来受害决非轻。”“崇正黜邪”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在维护王朝统治秩序中特意强调的内容。“七教”所言之“邪”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则是增加了天主教的内容，反映着自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及其引起的文化反抗。其二为第九教，全文为：“九教汉回要和睦，自古贤人忘旧恶。从前只为结仇讐，闹动干戈不得休。汉也吃亏回也苦，性命都如鱼入釜。何如回汉两相安，家家骨肉庆团圆。”则是对同治陕甘事变后，迫切需要重建区域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的现实反映，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讽劝汉回相安的思想。

周铁真，即周汉（1842-1911），字铁真，晚年号铁道人，笔名周孔徒，湖南长沙宁乡人，清末为反洋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¹《宁乡县志》曾载其事迹：

汉幼为诗文，有奇气。十五入学，谈经济，弱冠从戎，转战湖北、安徽、江西各省，保知县。……会左宗棠督师入关，汉随征回捻，积功擢同知直隶州。八年刘松山殉难金积堡，从子锦棠接统湘营。汉总理营务，尝单骑探寇情，右臂受矛伤。既克金积堡，将士争欲屠城。汉急作免死文告昭示，全活且二千人。十一年随战西宁，解城围。宗棠奏请以知府留陕西补用，赏花翎。宗棠督师新疆，刘锦棠出关，常与士卒同甘苦。光绪二年八月，以同克古牧地乌鲁木齐及迪化城，论功擢道员，加二品衔。²

由此可见，周汉与余泽春、刘厚基一样，同为左宗棠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尤为刘锦棠父子所器重。这就使其保有湖湘文化的文化底色，又深受左宗棠文化思想，尤其是左宗棠重建西北社会秩序文化思想的影响。

周汉《教民歌》³带有浓厚的湖湘文化⁴的色彩。宋元明时期，理学鼎盛；有清一代，程朱理学则被尊为正统官学，而湖湘文化对程朱理学尤为执着。故论者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更是程朱理学的倾心崇拜者……湘军理学经世群体，虽然大多出身寒微，没有显赫的政治背景，但是他们都醉心于程朱理学，以正統的儒学思想培养自己‘护圣卫道’的文化品格。他们强调‘义理’之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重道义、守伦常、维纲纪。按照三纲五常来约束自己的行为”。⁵因而，湖湘文化不遗余力地攻击一切“异端邪说”，以维护程朱理学的“正学”地位，甚至将镇压太平天国视作是理学对西方宗教文化的胜利。战后，他们试图通过刊刻《船山遗书》、广建祠庙、大修地方志、兴建学校等文化重建活动，消除异端文化，实质上则是“借用旧的文化政治资源，以礼治文化为核心，以忠孝节义为对象，进

中战功卓著，地位堪称湘军之首。

¹ 刘泱泱：《周汉反洋教案述论》，载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近代教案史研究会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73-395页。

² 周震麟、刘宗向：《民国宁乡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9页。

³ 用通俗歌谣教化不识字的兵和民，似为湘军共通手段，因而军民皆有传唱。除了本文中《教民歌》之外，譬如曾国藩曾作《爱民歌》《得胜歌》等（参看范广欣：《以经术为治术 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8-339页）。

⁴ 湖湘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和“理学为本”。因此，湘军统兵训练中既重视实操，亦强调大义（宣教）。这一传统在王鑫、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训练湘军过程中皆有体现。湘军统帅针对战事所需，发表不同主题的宣教文书，其中包括不少歌曲体裁，如：《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等（参看王盾：《湘军志》，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19-125页）。

⁵ 刘少虎、刘觅知、许顺富：《地域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湖湘文化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478页。

行传统文化的重建活动。”¹ 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均将前人陶澍、魏源、贺长龄等湖湘学人思想奉为圭臬，崇尚理学之本，推行经世致用之说。

老湘军的文化重建，体现出的保守性与坚韧性，在左宗棠湘军集团中持续发展，但在周汉身上体现得尤为顽强。自新疆返乡后，周汉联合同道，刊刻了大量反洋教的揭帖，其中如《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等，引起外国传教士的警惕与强烈抗议。清廷谕张之洞等进行查办，批评周汉“言语荒诞，迹类疯狂”，“着即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出外滋生事端”。²面对清廷的压力，周汉并不屈服。光绪十六年正月一日，周汉慨然称：“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灵，稽首自称真铁汉。”³周汉所遵神训与圣谕者何？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另一份揭帖中，周汉称“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帝都同尧舜各位圣人一样的德行，一样的教化。于今到处宣讲圣谕十六条，你们常听，都是明明白白了的，欢欢喜喜学的。这圣人之教名曰儒教，看是好呀不好，正大不正大呀！……可见世上只有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⁴清楚地表达了以清朝康熙帝为神圣，以其《圣谕十六条》为根本，以儒家礼教为遵循而兼及释道，坚决反对天主教等邪说的坚定立场。

周汉《教民歌》可谓从整体上展现了“湘军集团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从军事层面稳定西北社会，尤为关键的是如何维持西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并以此作为善后的终极目标”⁵。因而，从中不难发现其中左宗棠治理陕甘教化风俗的烙印，及其由此立场而试图从重建西北社会秩序的文治方案的种种痕迹。左宗棠率领进入西北的湘军，骨子里虽然仍是湘军，同属湘军文化集团。实际上，湘军内部的派系较为复杂，而其所指挥的军队“还全为原是在湖南巡抚幕府中所实际指挥”，因而他在“军队中的渊源，和他对于师友的渊源，一般的和国藩不同，自成一个系统”。⁶这就使左宗棠湘军集团不仅有组织上的基础，同时也有思想脉络上的一致性，易达成政令上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周汉《教民歌》乃左宗棠重建西北社会秩序所行文治教化的通俗版和简化版。左宗棠对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不仅认为“一道同风”可期，即如回族“年幼能读书者仍当飭入义学，以期读书明理，同为圣贤之徒，即将来人物科名亦未可量”⁷。他的这些文治教化之功远远超越了《教民歌》所表达的内容，而其中蕴含的思想性、开放性、包容性，乃至试图以程朱理学为核心构建中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努力，则又是周汉本人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所难以企及的。

四、余论

左宗棠奉程朱理学为正宗，试图通过大力推行文治教化事业和喜闻乐见的宣传传播，使西北各民族变旧俗同华风，确立共同的社会价值核心，奠定西北地区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左宗棠信服朱熹的“理”“气”论，本“皆朝廷赤子”的理念，公平公正地处理各民族的关系，通过加强西北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到教养兼顾、政教修明。周汉《教民歌》的发现，打开了认识左宗棠及其湘军集团重建西北社会秩序的一扇窗，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左宗棠努力实现西北地区各民族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道同风”。

¹ 罗宏、许顺富：《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7 年，第 252 页。

² 《光绪朝实录》卷 310，“光绪十八年四月癸丑”，《清实录》第 56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40 页。

³ 周汉：《谨遵圣谕辟邪》，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 1984 年，第 175 页。

⁴ 周汉：《鬼叫该死》，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 1984 年，第 194 页。

⁵ 赵维玺：《湘军集团与西北回民大起义之善后研究：以甘宁青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第 31 页。

⁶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 1984 年，第 50 页。

⁷ 左宗棠：《平凉善后局冯道邦稷禀回民陈林等请建清真寺由》，《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4 年，第 272 页。

左宗棠受命剿抚陕甘事变，西征平阿古柏之乱，在西北推行儒家文治教化以求实现各民族的“一道同风”。左宗棠重建西北社会秩序的文化政策，具有指导思想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如果研究者抛开了其以儒治世的根本立场，漠视了其以程朱理学为圭臬重建社会价值核心的努力，难免就会以所见即为所知，造成对左宗棠本身历史的割裂，产生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此外，即使对其具体政策的评价，也需要放在整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量，方不至于造成曲解。如关于左宗棠迁移安插回民，已如前文所述，兹不赘言。再如，关于编设保甲与实施路票制度，倘若以为只是针对安插回民所立的制度，自然不免引出民族歧视与民族隔离的想法。如能认识到，这些均不过是明清以来王朝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普遍手段，也就不难将之视为左宗棠企图实现西北区域社会与内地“一道同风”的措施之一。

要之，对人物的研究，无论研究者的立场如何、范式如何、方法如何，充分占有资料，系统梳理脉络，并将之嵌入大时代的宏阔背景，则是获取正确认识的基本保障。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处于时代更迭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呈现出思想上的新旧杂糅与人物活动的多样，极易肇致认识上的多歧。惟有从其认识论上，探究其思想根源，以其思想为纲，以其活动为目，纲目并举，方能有深层次与根本上的把握，获致系统的认识与同情之理解。倘若研究者，不能从其思想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去研究，难免就会偏执于其一叶而不见森林，就事论事，欲窥其一斑而不见全貌，失其经世之大略而不著，求其得失之枢机而不能。

【论 文】

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认知与争论¹

王 娟²

新中国成立后，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配合，中央和各级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少数民族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地位、经济机会和文化水平的优惠政策。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或“统一高考”）中，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录取政策是这一总体性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优惠政策被公众笼统地称为“民族加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对个体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社会舆论对这项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讨论也日益高涨。然而，由于缺乏对高考优惠政策的整体框架及其变迁过程的历史性关照，也缺乏对“民族加分”在不同地区的地方化实践形式的全面了解，相关讨论往往流于对“公正”、“平等”等价值观的抽象争论，而难于对这项政策的深层价值目标和未来改革方向做出有效解释和准确判断。

本文将系统地回顾中国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的变迁，从价值基础、实践形式、引发的社会事件和近期的改革等角度，呈现中国社会关于少数民族优惠议题的认知与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政策改革方向。

¹ 本文刊发于《二十一世纪》2024年4月号，第21-34页。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一、背景：中国统一高考中的优惠录取政策

本文关注的主题是中国统一高考中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录取政策，但是在高考中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特殊群体并不只有少数民族。因此，在讨论所谓的“民族加分”之前，需要对高考优惠政策的整体框架和“民族加分”在其中的位置有所了解。

中国的高考制度于1952年正式设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十一年，于1977年恢复并延续至今。《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是文革结束后出台的第一个关于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革期间积累了大量知识青年，考生的年龄、社会背景、文化水平的多元性程度很高，“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¹因此高考的报名资格和录取条件要考虑到对多样化人群的覆盖和吸纳。在此背景下，这份文件中没有明确的优惠条款，但罗列了一些需要“注意招收”的群体，即：“医学院校要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师范院校要注意招收表现好的民办教师，农业院校要注意招收表现好的农业科技知识分子。要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程度可适当放宽，但入汉语授课院校的要具有一定的汉语听写能力。要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要注意招收女学生。”²这个“注意招收”的要求可视为优惠录取政策的雏形。

此后的十年是高考制度日益完善的阶段。³随着知青入学的遗留问题逐步解决，高中应届毕业生成为考生主体，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1998年后改称教育部）于1987年制定和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统一高考的制度化体系初步建立。该条例明确罗列了十二种可以“适当降低分数，择优录取”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考生群体。这十二种优惠对象根据特点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对象是高中阶段在学业、思想品德、体育等方面表现优秀、取得突出成绩的考生，如地区级以上“三好”（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学生、省级以上学科竞赛优胜者、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优胜者等。这类优惠的目的是对考生在高中阶段的优秀表现和成绩予以奖励，因此可称为“奖励性优惠”。第二类对象是具有特殊身份或特殊贡献的考生，包括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退役军人、烈士子女等。这类优惠与政府的政策导向相关，因此可称为“政策性优惠”。其中，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录取政策的具体表述是：“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分数，择优录取。对散居于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⁴

在此后的近三十年中，在统一高考中对一些特殊群体予以优惠的总体精神没有发生改变，上述分类逻辑也一直保留下来。但与此同时，对优惠对象的资格限定和具体的优惠方式、优惠幅度等细节则始终处于调整和完善中。其中较重要的修订是在2001年增加了“符合……所列情形的考生增加或降低分数投档，一般不得超过20分”的条款，即规定了优惠幅度的上限⁵。尽管在具体实践中，优惠存在“加分”（“在考生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分数投

¹ 《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7年10月6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1977-200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文件选编》，上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² 同上。

³ 参见田方萌：《反思平等主义——中国高等教育招生优惠政策评议》，《二十一世纪》2022年2月号，第29-31页。

⁴ 《关于发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的通知》（1987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www.moe.gov.cn/s78/A15/xss_left/moe_776/s3258/201001/t20100128_79925.html。

⁵ 《教育部关于做好200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7/moe_13/tnull_5496.html。

档”)和“降线”(“在院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投档”)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¹但二者没有实质差异,因此在一般性的话语中,这项政策被笼统地称为“高考加分”,其中包含“优秀学生加分”“竞赛加分”“体育加分”“民族加分”等类别。

在2001年的调整后,“高考加分”的政策框架基本稳定下来,大体未变地执行到2010年。但在这一时期,公众对在以公平为第一要义的高考中对特殊群体予以优惠的合理性不断提出质疑,同时发生了一些引发全国性舆论热潮的社会事件。影响最大的事件是2009年重庆市文科高考状元的少数民族身份造假,事件曝光后在重庆本地和互联网上都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在此背景下,从2010年起,高考优惠政策再次进入改革期。当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公安部、体育总局、中国科协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缩减了奖励性优惠的资格范围。²2014年,五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将包含五个大类(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的奖励性优惠全部取消,中国高考开始向“后加分”时代过渡。但另一方面,在这次力度空前的改革中,政策性优惠(包括烈士子女,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五个类别)的条款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提出了加强考生资格审核、信息公示等方面的要求。³

那么,为什么奖励性优惠与政策性优惠在改革中的命运如此不同呢?对此,教育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生主管部门都就政策变革的背景和目标进行过解释和说明。例如,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在发布本省的改革文件后,专门就改革内容做出了解释,其观点很有代表性⁴:

高考加分项目作为高考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地发展、为高校选拔人才提供多元评价等多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许多当时制定加分政策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加之近几年来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全国不少省市不同程度存在着诸如部分家长和考生为获取加分的资格或身份而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问题,社会上要求规范和调整高考加分的呼声较为强烈,调整高考加分项目势在必行。

而对于保留政策性优惠的原因也做出了说明⁵:

在调研高考加分项目调整时,社会各界有个共识,认为对于为国家、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群体及其子女,比如被授予一定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烈士子女,因公牺牲的军

¹ 例如,在教育部发布的《200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第三十条针对“省级优秀学生”等四类考生的优惠方式是“可以在考生考试成绩基础上适当增加分数投档”(“投档”指将分数达到一定标准的考生档案投放给招生学校),第三十一条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等另外四类考生的优惠方式是“可以在院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投档”(“调档”指将分数达到一定标准的考生档案调出)。这一区分分别对应于前述“奖励性优惠”与“政策性优惠”的区分,但在实际录取工作中的效果是相同的。

² 《教育部 国家民委 公安部 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2010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1011/t20101114_112379.html。

³ 《教育部 国家民委 公安部 体育总局 中国科协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2014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网,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43782.htm。该意见规定从2015年起取消全部奖励性优惠,但根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在2015、2016、2017三年高考中,对2015年1月1日前取得、在原政策下享有优惠资格的成绩予以承认,因此直到2018年高考,奖励性优惠才真正全部取消。

⁴ 《广东:2014年高考加分项目调整方案出台》(2012年3月2日),阳光高考网,
<https://gaokao.chsi.com.cn/gkxx/ss/201203/20120302/286320095.html>。

⁵ 同上。

人和人民警察的子女等，在高考时应给予适当加分。同时，由于我省区域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也不均衡，欠发达地区学生受教育的条件相对薄弱。因此，对这些特殊群体考生予以照顾，在高考时给予适当加分，体现了国家的关心，也更好地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和公正。

以上解释显示了“高考加分”这个笼统的标签下所包含的不同的政策目标和价值理念。奖励性优惠的设立与取缔针对的是教育本身的目标（如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等），而政策性优惠则指向公平、公正、社会团结等更为深刻的社会性目标。这个区分可以作为分析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民族加分”政策的基础。

二 因地制宜：“民族加分”的地方性实践

在讨论高考少数民族优惠录取政策时，另一个需要了解的背景是，中国高考采取的是“统一考试、分省录取”的方式。因此，前文梳理的政策文本中的优惠政策条款代表的是中央层面对相关问题的指导性意见，但各省（区、市）的录取政策是由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制定的。在不违背全国性的政策原则的前提下，不同省级行政单位的高考录取政策有较强的地方自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优惠类别中，“民族加分”的地方性是最突出的。以2010年各省（区、市）录取政策为例，针对非少数民族类别的优惠对象，不同省级行政单位所执行的优惠条款差别不大，都给予了加分优惠，只是有些省份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的上限给予了20分优惠，而有些省份将优惠分值设定为10分。与之相比，不同省（区、市）的“民族加分”条款则差异巨大，各具特色。例如，在山西省，少数民族考生不享受加分优惠，只是“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河南省和安徽省，所有少数民族考生都可获得5分优惠；在福建省，只有户籍在规定的县、乡、区的畲族、回族、高山族考生，以及户籍在高山、海岛上的少数民族考生可获得10分优惠，其他少数民族考生不享受加分优惠；在湖南省，户籍在省内的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的少数民族考生可获得20分优惠，汉族考生亦可获得10分优惠，而户籍不在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考生，农村考生可获得10分优惠，城镇考生可获得5分优惠。以上几个例子充分显示了高考“民族加分”在具体实践中的地方性。

“民族加分”条款的多样性和地方性，反映的是“少数民族”这个身份标签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多样性和地方性。与之相比，其他的优惠类别——如“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赛区一等奖”或“烈士子女”——的社会意义是相对普适的。这是由中国的民族结构特征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安排决定的：

首先，从客观特征来看，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在领土上的分布极不均匀。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江苏六省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均低于1%，另有十一个省（直辖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低于5%。在这些位于中国东、中部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聚居程度低，城市化率高，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汉族差异不大。与之相对，五个自治区及青海、贵州、云南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都超过了20%，其中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超过50%。这些“少数民族大省”的共同特点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聚居程度较高，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各具特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常低于汉族。但另一方面，它们在民族结构上也不尽相同。在五个自治区，“命名民族”的人口数量占本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超过或接近80%。而在青海、贵州、云南，省内少数民族的类别更多，人口也更为分散。其中民族结构最复杂的是云南省，共有二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¹，其中有六个人口超过百万，九个人口在十万至百万之间，还有

¹ “世居民族”是中国民族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本土化概念，指历史上就居住于该地区的民族；各省（自治

十个人口少于十万；有些少数民族（如白族、纳西族）的受教育水平与汉族持平甚至超出，有些则显著低于汉族。可见，尽管在政策文本中，“少数民族”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但在具体实践中，它的含义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情境性。可以设想，在北京、山西、内蒙古和云南，不同地区的普通民众在提及“少数民族”时，所指代的具体形象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国的行政体系中包含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个级别的自治地方，自治地方相比于非自治地方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政治地位，个体的少数民族身份也具有一定政治意涵。但是，这种“特殊性”的法理基础和实践边界是什么？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民族理论中，这是一个答案尚不清晰或者说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并不相同。

由于上述特点，中国高考中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一项典型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在制定“民族加分”政策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身份在本省（区、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并使之体现在对优惠资格和优惠幅度的限定中。以下两节将结合案例就高考“民族加分”的地方性差异中所体现的深层逻辑展开讨论。

三 权利还是补偿？——高考“民族加分”的价值基础

如果说统一高考中的政策性优惠都具有超越教育本身的社会性目标，那么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的社会性目标是什么呢？如果说各省（区、市）的“民族加分”政策都体现了少数民族身份在地方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由于高考中的“民族加分”是更大范畴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需要从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基础开始。梳理建国以来的政策文件，结合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讨论，对于“为什么少数民族应该在某些领域享受优惠待遇”的问题，可以提炼出两种观点：第一种可称为“权利观”，主要是指将对少数民族个体或群体的优惠视为这个群体在现行政治体系下的固有权利。这是西方式的地方自治和联邦体制的法理基础。这种权利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指根据地方（民族）传统来制定和执行某些制度、政策及分配资源的权利，可简称为“自治权”；对外则是少数民族在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中占有一定席位，这通常被称为“特别代表权”。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小，因此这个席位的数量通常会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即“超比例代表”。

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体系中，显然包含了对这种权利观的确认。对内权利体现在对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干部配额、民族语言使用等的明文规定或隐性规则；对外权利在政治上体现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少数民族的超比例代表，在经济上体现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性的资源再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在全国统一高考中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可以视为对少数民族的特别代表权的认可，只是这里的“代表”不是体现在立法机构中的“席位”，而是体现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流动“列车”上的“座位”。

与权利观相对的另一解释可称为“补偿观”，主要是指将对少数民族个体或群体的优惠视为对这个群体在现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下的不利地位的补偿。对少数民族予以补偿的观念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包含了“向后看”和“向前看”两个面向：“向后看”是对“历史上长期处于统治民族的地位”的汉族对少数民族所负有的“历史债务”的“补偿”，即所谓的“还债”¹；“向前看”则是指要对当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

区、直辖市）的“世居少数民族”的名单是在1950年代民族识别时确定的。

¹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广西籍人士协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提到：“我国历史上事实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汉族处于优势，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处于劣势，不易得到发

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差异予以弥补和匡正，通过援助性的资源再分配，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事实上的平等”。简言之，这里存在一个“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等式。因此，在某些领域赋予少数民族以优惠待遇、拉平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差距，被视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下体现和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手段。

权利观和补偿观代表了对中国民族制度的法理基础的不同理解。二者的矛盾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当落实为具体政策时，不同的理念可能会导向方向相反的实践。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正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例证。高考中的“民族加分”究竟是少数民族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还是对少数民族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和相对欠缺的教育资源的补偿？前文引用的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对保留政策性优惠的解释代表了补偿的视角和逻辑，但这并不是各省（区、市）在理解和改革高考“民族加分”政策时的唯一逻辑。

内蒙古、宁夏、广西都是省级自治单位，但三个自治区的高考“民族加分”政策差异巨大。各省的优惠政策在过去若干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本节选择三个自治区在2010年的政策进行对比，代表了它们在2001至2010年的政策稳定期的优惠条款。三者的比较显示了对这项政策的价值基础的不同理解如何导向了方向有别的政策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高考中的“民族加分”政策简单明了，确定优惠资格的指标只有一个——是否属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俄罗斯族这五个民族。这五个民族的考生，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农区还是牧区，都可以在高考录取中享受加10分的优惠，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考生则不享受优惠。那么，为什么是这五个民族享受加分优惠呢？这五个民族与自治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数量更多的满族和回族——的差别是什么呢？事实上，内蒙古的高考“民族加分”的优惠对象是在本区内具有自治地位的民族，即各级自治地方的命名民族。除蒙古族是自治区的命名民族外，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在内蒙古内拥有自治旗，俄罗斯族拥有民族乡。因此，在内蒙古的高考录取政策中，“谁应该享受优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自治区内拥有自治地方，因而具有自治地位的民族。在这个标准下，尽管内蒙古的满族、回族的人口规模要大于本区内除蒙古族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但由于这两个民族在内蒙古没有自治地方，不具有自治民族的地位，因此不能享受优惠政策。内蒙古高考中的“民族加分”政策正体现了权利观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理解，即将“加分”视为对自治民族的特别代表权的承认和保障。

与内蒙古毗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高考录取政策与此相似，但增加了新的指标。在宁夏高考的“民族加分”政策中，同时运用了“民族”和“地区”两个指标来界定考生身份，从而确定优惠对象的资格。“民族”分为三类：回族、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地区”分为两类：山区、川区。两个指标交叉，形成六个类别，对应了不同的优惠力度（表1）。

表1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考“民族加分”的分类和分值，2010年

地区 \ 民族	回族	其他少数民族	汉族
山区	30	20	10
川区	20	10	0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2010年5月12日）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得，参见阳光高考网，

<https://gaokao.chsi.com.cn/gkxx/ss/201005/20100512/89217834-5.html>。

展，而且常受欺压，所以应该讲还债，汉族应该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如果不叫还债，叫作‘陪[赔]不是’也可以。”参见《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广西籍人士举行会议 协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一致赞同建立省一级僮族自治地方和采用“合的方案” 周恩来主席作总结发言，谈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第1版。

¹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占比前五位的民族是汉族76.74%、蒙古族19.33%、满族2.32%、回族0.89%、达斡尔族0.36%。

这两个指标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优惠逻辑。“民族”体现的是权利观，作为宁夏命名民族的回族享有最高的优惠力度，但同时也给予其他少数民族以一定的优惠，而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则大多不享受任何优惠。“地区”体现的则是补偿观，这里对“山区”的范围有明确规定，特指“固原市（含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和海原县、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开发区及行政区划调整后部分乡（镇）和原陶乐县”¹，由于这些县区地理偏远、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教育资源欠缺，因此对来自这里的考生给予相对于其他县区考生更大的优惠；即使是山区的汉族考生，也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

与前两个自治区相比，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策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和逻辑。在广西的高考“民族加分”政策中，同样使用了“民族”和“地区”两个指标对考生进行分类。“民族”分为三类：（1）十个世居少数民族（瑶、苗、侗、毛南、仫佬、回、彝、京、水、仡佬）²；（2）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3）汉族。“地区”分为四类：（1）十二个自治县和五个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县区；（2）三十三个山区县和边境县；（3）中间地区；（4）五市（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城区。其中第一、二类是广西境内经济最不发达、教育资源最欠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大的地区，第四类是经济最发达、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而第三类则是经济发达程度和教育资源介于两者之间的地区。在两项指标上，优惠力度都是从高到低递减，但二者并非完全交叉叠加。例如，十个世居少数民族只要不是居住在最发达的第四类地区，就可以享受 20 分的加分优惠；如果居住在第四类地区，则加分优惠降至 10 分。而对于居住在较不发达的第一、二类地区的考生，则任何民族（包括汉族）都可以享受加分优惠（表 2）。

表 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考“民族加分”的分类和分值，2010 年

地区	民族		
	十个世居少数民族	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汉族
十二个自治县和五个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县区	20	20	20
三十三个山区县和边境县	20	10	10
中间地区	20	7	0
五市城区	10	5	0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10 年 5 月 7 日）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得，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gxzf.gov.cn/zfwj/zzqrmzfbgtwj_34828/2010ngzwbwj_34837/t1507790.shtml。

单从结构上看，广西与宁夏的“民族加分”政策似乎差别不大，只是广西的政策对考生的分类更为细致；但事实上，二者对民族指标的运用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在宁夏的政策中，最高等级的优惠赋予了自治区的命名民族——回族，而其他少数民族只能享受次一等级的优惠；而在广西的政策中，享有最高等级优惠的是十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并不包含自治区的命名民族——壮族。除了居住在最不发达的第一类地区的壮族考生可以享受与其他民族考生同样的 20 分优惠外，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壮族考生所获得的加分优惠尽管整体上高于同类地区的汉族考生，但远低于十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考生。广西的政策无疑体现了补偿观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中的实践。壮族作为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将更高的优惠赋予处于相对劣势的其他少数民族，有助于弥补和匡正地区、民族间的发展不均衡。

以上对内蒙古、宁夏、广西三个自治区的高考“民族加分”政策的比较显示，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基础的认知和理解并不一致。内蒙古、宁夏两地的录取政策更多体现了将优惠视为自治地方命名民族的权利的观念，而广西的录取政策则将优惠

¹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定》（2010 年 5 月 12 日），阳光高考网，<https://gaokao.chsi.com.cn/gkxx/ss/201005/20100512/89217834-5.html>。

² 在官方定义中，广西有 12 个世居民族，包括汉族、壮族和此处所列的 10 个少数民族。

视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在同样的总体性原则下，不同省（区、市）发展出了方向相左的政策实践。

四、“精细裁剪”：高考“民族加分”政策的舆论焦点

尽管权利观的确存在于中国的民族制度和政策的底层逻辑和具体实践中，但在中国社会关于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公共认知中，该政策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补偿观之上的。因此，社会舆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公平”这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展开的，这对于理解关于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公共讨论非常重要。

如前所述，将补偿视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价值基础是建立在“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等式之上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就平均水平而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水平仍有差距，但不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同一少数民族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发展差异已经超过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平均差异。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补偿的社会性目标，前提是对需要补偿的对象予以精准的确认。这正是本节所讨论的“精细裁剪”(precisely tailored)的要义所在，它构成了关于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公共讨论的焦点。

“精细裁剪”的概念借用自美国 1990 年代以后在“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又称“平权行动”)中提出的原则。¹美国高校录取中的肯定性行动在实施初期，广泛采用种族配额的形式，以增加非白人（尤其是非裔）学生的录取机会。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公众对这一政策的质疑愈来愈多，不断有白人落选者向法院提出“反向歧视”的诉讼。从 90 年代起，单一种族配额的录取方式被全面废止，但在法律层面上并未否定在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原则，只是要求不得将种族作为唯一的考量因素，而需针对每个考生的具体情况，综合考查各方面的条件来做出录取决策。这个原则被称为“精细裁剪”。

尽管中国的高考制度与美国的高校录取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但在美国肯定性行动与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之间，仍存在可比较的相似之处。由于中国高考录取的首要依据是高考成绩，而包含“民族加分”在内的优惠政策都是辅助性的，因此中国式的“精细裁剪”就主要体现为如何对考生进行更为精细的分类，从而使得“加分”能够尽可能精准地惠及那些在经济和教育资源上处于不利地位而机会受限的群体。事实上，优惠政策的执行方式不够精准，是公众对这项政策的批评和质疑中最重要的问题。

以贵州与云南为例，两者都是位于西南地区的多民族省份，不仅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大，而且种类多样，是高考“民族加分”实施力度最大的省份。同时，两省的民族结构、类型和基础教育条件相似，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2018 年高考成绩公布后，贵州的“民族加分”政策引发轩然大波。一张全省文科前二十名的成绩单截图在互联网上流传。在这份成绩单上，“裸分”（未经任何加分）第一名是一位汉族考生，但最终仅排名全省第二十名，而前十九名考生都因少数民族的身份而获得了 10 至 20 分的加分。这一事件不仅在贵州省内引发了汉族考生和家长的大规模抗议，而且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热潮。但仔细分析舆论内容，公众的质疑焦点并非“给予教育

¹ “Affirmative action”指形成于美国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旨在消除对少数族群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歧视。该词条于 1961 年 3 月 6 日在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签署的（第 10925 号总统行政命令）中首次正式提出，要求政府承包商“采取 affirmative action，以确保申请人在被雇用、雇员在工作中一律不考虑其种族、信仰、肤色或原籍”，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由总统行政命令、部门条例、司法裁决、法律条文等多种类型文件构成的政令和法律体系。目前中文学界对此词条的翻译尚未统一。可参阅王凡妹：《肯定性行动——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3-28 页。

资源不足的少数民族考生以一定优惠”这个一般性原则，而是以民族身份作为唯一标准而不考虑教育资源占有情况的做法，以及由这一政策所导致的民族身份造假现象。

贵州所执行的高考“民族加分”政策，正是典型的“一刀切”式优惠，所有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都可以获得 10 至 20 分的优惠（表 3），这导致在 2018 年的贵州高考中有超过 40% 的考生获得了至少 10 分的“民族加分”，其中很多考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享受的教育资源都与汉族考生无异，甚至更优。当补偿没有精准地惠及真正的劣势人群时，它就成为了损害社会公正的帮凶。

表 3 贵州省高考“民族加分”的分类和分值（2018 年）

地区	民族	
	少数民族	汉族
3 市（贵阳、安顺、遵义）城区（共 9 个区）	10	0
其他地区	20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贵州省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18 年 4 月 28 日）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得，参见贵州城市职业学院网，<http://www.gzcsxy.cn/article.jsp?id=6071&itemId=69>。

事实上，在西南地区的几个省级行政单位（贵州、云南、四川、重庆）中，贵州的高考“民族加分”政策是非常“不典型”的。就全国范围来看，在东、中部各省，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少、优惠分值较低，“民族加分”对各省高考成绩结构的影响不大，因此这些省份的相关政策对优惠对象的资格限定通常也较为宽泛。与之相对，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类别繁多、地方性的多民族结构非常复杂，同时优惠分值也普遍较高，“民族加分”的社会影响较大，受到的社会关注也更高。因此，总体而言，西南省份的高考少数民族优惠的精细程度是比较高的¹。

与贵州毗邻的云南的高考优惠政策就是中国式“精细裁剪”的典型案列，综合运用了“民族”、“地区”和“城乡”三个指标，对考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首先，“民族”一项并非简单区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而是根据本省 26 个世居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教育资源分布——划分为四类：（1）19 个教育水平最低的世居少数民族（哈尼、傣、苗、傈僳、拉祜、佤、景颇、瑶、布朗、怒、阿昌、普米、德昂、独龙、藏、蒙古、基诺、水、布依）全部拥有加分资格；（2）两个教育水平较低的世居少数民族（彝、壮）部分拥有加分资格；（3）4 个教育水平较高的世居少数民族（白、纳西、满、回）仅在居住于特殊地区时具有加分资格；（4）汉族和非世居少数民族在居住于特殊地区时具有加分资格。其次，除“民族”外，还同时运用了“地区”和“城乡”两个指标。“地区”区分为边疆县、内地山区县、内地非山区三类；居住在教育资源最欠缺的边疆县的考生，不论什么民族，都可以获得最高标准的 20 分加分；而居住在教育资源较丰富的内地各县区的考生，则或者没有加分资格，或者仅可以获得较低标准的加分。“城乡”指标是对“内地非山区”的进一步细化，且只针对彝族、壮族这两个民族，其农村考生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而城市考生不享受（表 4）。

表 4 云南省高考“民族加分”的分类和分值，2010 年

地区及城乡	民族			
	十九个世居少数民族	彝族、壮族	白族、纳西族、满族、回族	汉族及非世居少数民族
边疆县	20	20	20	20
内地山区县	20	20	20	0
内地其他县区	农村户口	10	0	0
	城市户口	10	0	0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云南省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10 年 5 月 31 日）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得。

¹ 贵州省的“民族加分”政策在 2021 年进行了改革，提高了精细程度。至于贵州省为什么多年执行非典型的“粗放”加分政策，应该与地方性的族群政治有关，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理而得，参见阳光高考网，<https://gaokao.chsi.com.cn/gkxx/ss/201005/20100531/94081983-5.html>。

对比贵州与云南的“民族加分”政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2018 年的贵州高考所引发的争论。最近十余年，公共讨论中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一直存在大量批评，但不应该将之简单地理解为公众对“应该给予弱势群体以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一社会价值的否定和放弃。与过去几年影响范围更大的“精准扶贫”工程类似，这类以扶持弱势群体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在价值层面上依然是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可的，而影响舆论评价的关键词是“精准”。当优惠无法精准地惠及目标对象时，补偿的社会价值就从根本上被损害了。在这个意义上，“精细裁剪”实际上构成了补偿理论无法剥离的要件。

五 改革与展望

尽管在 2014 年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中，包含“民族加分”在内的全部政策性优惠都被保留了下来，这显示在中央层面仍然肯定少数民族高考优惠具有合理的社会性目标和价值；但在地方层面，各省（区、市）的清理加分项目的改革已经逐渐拓展到“民族加分”。这类改革首先在东、中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小的省份发生，并逐渐向西部省份扩展。不同省份的调整力度和节奏不同，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缩小优惠规模、降低优惠力度。至 2023 年，取消“民族加分”的省份已增加至六个（山西、陕西、山东、江苏、江西、安徽），其他许多省份也出台了调减或取消“民族加分”的时间表。至 2026 年，“民族加分”在各省高考中的覆盖范围和优惠力度都将大幅减小。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从 2014 年起中国统一高考中的各类优惠项目（包含奖励性优惠和政策性优惠）陆续缩减乃至取消，并不意味着与这些优惠政策相联系的价值观（鼓励高中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有专长，“给予弱势群体以一定的扶持性优惠”）被否定和放弃。优惠政策的缩减和取消是与高考制度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同步进行的。在“竞赛加分”、“体育加分”等奖励性优惠项目被全面取消的同时，高校自主招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和“高水平艺术团”等招生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并日益完善。这些新的渠道依然为在高中阶段表现优秀、拥有特长的考生增加了入学机会，但避免了“加分”这种形式上有悖公平竞争原则的方式。

与此类似，在各省（区、市）的“民族加分”项目不断缩减乃至取消的同时，国家专项计划¹、高校“筑梦计划”²等各类针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逐步发展起来。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与贫困人口的重合度很高，因此这些专项计划仍可惠及大量少数民族考生。

上述改革和替代方案主要涉及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改革则发生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

北京是中国教育资源和高校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高考难度相较于其他省份小很多。在 2004 年以前，北京高考录取政策中“民族加分”的分值是 10 分，并且不区分民族和地区，只要是少数民族的考生都可以享受这项优惠。从 2005 年起，“民族加分”政策进入持续改革期，首先增加了“仅适用于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条款，即将“民族加分”从全国性加分降格为地方性加分，如果考生报考教育部直属高校或其他省市高校，将不能享受此项优惠。这体现了政策性优惠“保底但不拔高”的改革方向。随后在 2014 年，这项地方性加

¹ 国家专项计划是一项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专项计划，于 2012 年开始实施，具体方式是在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适量招生计划，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

² “筑梦计划”是一些重点高校在自主招生中面向优秀农村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及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分的分值进一步下降至5分。2017年，北京的高考“民族加分”项目迎来了最重大的改革，优惠对象从“少数民族考生”变更为“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转学到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当年，北京市共有6,405位少数民族考生，但只有四人符合高中阶段从“四区”转学至北京的条件，即仅有四位考生有资格享受“民族加分”，而前一年在原来的优惠条款下符合资格的考生达到6,391人¹。在此后的几年中，符合“民族加分”条件的考生数量经常是0。

这个改革方案的值得探讨之处并非是大幅缩小了优惠对象的范围。尽管从实际效果来看，北京的方案与山东、陕西等省直接取消“民族加分”的方案并无太大差异，但从底层逻辑上看，它体现了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代表了对新形势、新情况下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改革方向的探索。这里的“新形势、新情况”是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中国的民族结构带来的变化。在1950年代新中国民族制度的奠基时期，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主要分布于西南、西北的边疆地区，而且大部分是乡村地区（包括农区和牧区）。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一结构性特征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构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这一流动不仅发生在汉族地区，也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离开传统聚居区（同时可能也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流动到本省的城市地区，甚至东部发达省份。尽管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规模远不足以在总体上改变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但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应对的变化。例如，有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大量外流，并在其他地区形成新的聚居区。在这个意义上，北京的方案代表了教育发达地区在全国性人口流动的新形势下对高考优惠政策的改革方向的探索；未来的优惠对象不一定局限于高中阶段从“四区”转学至北京的少数民族考生，也可能拓展到所有高中阶段从贫困地区转学至北京的考生。

北京的这项“特立独行”的改革并非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的一己之见，2017年上海的高考招生政策也做出了同样的改革²。这两个当前中国经济最发达、教育资源最丰厚的直辖市同时进行的改革，无疑反映了中央层面对“民族加分”乃至高考优惠录取政策的改革方向的思考。

¹ 张航：《今年高招照顾对象名单公示 7123人次可享照顾 仅4人获少数民族加分》，《北京晚报》2017年6月14日，第7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北京市高考的“民族加分”从2005年开始就仅适用于市属高校招生，因此并非所有少数民族考生都会在录取中享受到这项优惠，这项优惠政策的实际覆盖范围远小于符合条件考生的人数。

² 参见《关于印发〈2017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秋季统一考试招生工作的办法〉的通知》，上海教育网，https://edu.sh.gov.cn/xxgk2_zdggz_rxgkyzs_04/20201015/v2-0015-gw_420032017006.html。另外，根据2020年天津市教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从2023年起，天津市的高考“民族加分”政策更改为与北京、上海相同的条款，参见《天津：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2022年2月28日），阳光高考网，<https://gaokao.chsi.com.cn/gkxx/zc/ss/202202/20220228/2169912292-9.html>。

【论 文】

中国藏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间探索与实践¹

李 健²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关键是当地少数民族有能力进入现代职业体系,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基础之一是获得良好的职业教育。民族地区的职教近些年获得了蓬勃发展,国家对民族地区职教的投入力度非常大,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民办职教也在持续探索,呈现出公办职教与民办职教齐头并进的局面。特别是藏族地区(本文中指西藏自治区和涉藏地区)的民办职教领域,过去几十年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性探索,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引领性和启发性价值,但目前还很少受到学术界关注,十分值得从基础案例入手进行实践经验总结,并提出理论性思考。

一、中国民族地区职教的重要意义与背景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民族地区的职教开始逐步得到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对民族地区职教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早在200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就在重庆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验交流会,提出要研究职教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积极扶持和帮助职教发展。当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已有各类职业学校1959所,在校生约104万人³。职教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人力资源支撑。

当前,中国进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民族地区职教具有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首先,通过发展高质量的职教,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发展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增值,从而在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好的竞争位置,有效缓解民族地区青年的就业压力。由于过去针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宽松,相对于汉族聚居地区,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更年轻,青年人口比例高,每年新增劳动力多,广大少数民族青年往往面临难以有效就业的局面。随着民族地区公职岗位的逐渐饱和,每年能吸纳的大学生已十分有限,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在藏族地区尤为凸显。在此情况下,发展高质量的职教,让青年获得一技之长,拥有在劳动力市场立足的人力资本,是改善就业的根本出路。从需求端看,根据2021年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社厅)发布的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计划,是年该区共有约6.9万个岗位需求,其中区内外民营企业岗位需求居多数,合占64%。⁴从供给端看,西藏主要通过区内的普通高中及区外由东、中部省市开办的内地高中班,再到大学录取的渠道培养人才,职教并不大受家长和学生欢迎。尽管西藏公职单位的就业吸纳能力趋于饱和,但当地大学生仍去争抢十分有限的岗位,形成就业拥堵;相反,能够支持各类产业发展的专门性职业技能人才不足,造成人才培养结构与实际需求结构不匹配,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形成青年人就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归根结底,是由于职教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面向基层的职教,可以有效培养实用型技能人才,满足民族地区城乡社区公共服

¹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4年4月号第202期,第35-49页。

²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家认同与族群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³ 冯文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开发西部的一把钥匙”,《民族团结》2000年第6期,第33页。

⁴ 数据来自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2021年第三批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计划,参见https://hrss.xizang.gov.cn/zpdx/202011/t20201130_245620.html,
https://hrss.xizang.gov.cn/tzgg/202011/t20210407_244624.html,
https://hrss.xizang.gov.cn/xwzx/202107/t20210706_249468.html。

务和产业发展领域对实用人才的需求。民族地区基层的医疗、教育等领域人才一直严重不足。以藏族地区为例，基层医疗、教育人才短缺是个长期问题，特别是在乡村幼儿园和小学、乡镇卫生院等机构最为突出。西藏本身的社会经济条件都较为艰苦，且内部各地市发展差异很大，目前西藏仍有将近 63%的人口居住在乡村¹。在一些偏远闭塞的农牧区，事实上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并不大，相反公共事业和乡村发展领域对一般实用型人才需求旺盛，但培养这些人才的中等职教并不发达，效果也还不够理想。供给严重不足。这种人才培养层次和基层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影响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现，但也给民办职教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再次，良好的职业教育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提升其跨越社会阶层的能力，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良性发育和现代转型。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良性发育的标志，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基。优良的职教，特别是灵活多样的民间职教，能够瞄准当地社会的人才需求痛点，将教育和就业更紧密结合，为少数民族青年提供更多元的职业发展机会。其中一部分接受职教后，依托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发展新型经济，可见良好的职教为基层青年开拓了更多就业和社会流动的渠道，也为少数民族青年创业者发挥才能和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新的舞台。

最后，有效的职教可以增强少数民族人员的跨地域流动性，扩展就业半径，增加不同民族人员之间的互动机会，促进民族间的彼此了解和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提出的战略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²。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将职教、发展实践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深度融合，成为一体。随着藏族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提升，东西部地区之间人员的往来、各发展领域的合作、发展经验的互鉴，更有助于价值理念层面的双向了解。如近年来藏族地区一些接受了良好职教的青年人积极开展社会创业，推动创新型社会企业发展，如生态旅游、民族手工艺、电商等新型产业的尝试，并形成了能够与东部发达地区开展平等对话和交流合作的宝贵领域，成为可以在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层面进行各民族深度往来的关键行业³。通过广泛开展东西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对话分享活动，实现价值互补、经验互鉴、人员互通，有望构建中国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的社会企业家群体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从深层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藏族地区民办职教的实践探索

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的职教，都具有上述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公办职业学校，以西藏公办职业学校为例，目前有 12 所中等职业学校（中专）和 3 所高等职业学院（大专），另外还有两所技工院校⁴，覆盖全区 7 个地市。公办职教设置专业全面，办学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先进，招生规模较大。此外，还有国家支持的内地西藏职业班校的开设，借助内地优质职教资源，进一步提升职教领域的办学水平，帮助藏族青年提升技能。藏族地区的民办职教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特点和灵活性优势，一般是由当地的藏族民间精英发起、根据地方社会实际需求而创办的，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性。事实上，公办与民办两种职教模式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良性格局。其中藏族地区的民办职教上接历史上的师徒制的职业传承体系，同时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变

¹ 《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2024）》（2024 年 1 月 7 日，中国经济网，https://disctrict.ce.cn/newarea/roll/202401/22/t20240122_38875902.shtml

² 潘岳，“祝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2024 年 1 月 26 日）旗帜网 www.qizhiwang.org.cn/n1/2024/0126/c458429-40167466.html;

³ 陈玉凤等，“社会支持视角下藏族大学生创业研究”，《职业教育》2023 年第 6 期，第 976-982 页。

⁴ 张雪芳，“西藏打造西藏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4 年 1 月 25 日），人民网 <http://xz.people.com.cn/n2/2024/0115/c138901-40714304.html>

革和新的实践探索。

笔者近几年持续关注藏族地区民办职教的典型发展案例，并于 2023 年夏赴四川、青海、甘肃等省的藏族地区做了专门的实地调查，对从事民办职教的关键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了若干有效的实践经验。

1. 传统师徒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发展

在藏族地区，有不少传统的民族手工艺具有近千年的传承历史，唐卡绘画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在 2006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以佛教题材为主的卷轴画类型，唐卡制作在历史上是一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传统职业，与之相伴的职教方式就是师徒制的技艺传承。通过建立于 15 世纪的西藏白居寺壁画题记可以知道，当时的唐卡绘画技艺主要通过家族内师徒制和家族外师徒制两种形式传授。这种传承方式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有所中断。80 年代初，西藏唐卡领域的民间职业教育重新兴起，尚健在的一批老一代画师开始重新招收学徒。此时学徒制的延续主观上是因为老一代画师意识到唐卡绘画技艺传承面临的危机，愿意培养新一代画师；客观上是由于藏族民间社会和寺院对唐卡及壁画绘制的需求大增，老一代画师需要通过招收徒弟和传授技艺，逐渐形成绘画团队。及至 90 年代，市场经济在西藏获得了普遍的发展，西藏以外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唐卡行业的更大发展，随之对唐卡绘画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推动了民间唐卡绘画学校的产生。

西藏旦巴绕丹唐卡艺术学校是众多民间唐卡学校的一个典型代表。该校由西藏唐卡绘画的著名传承人旦巴绕丹老先生于 1980 年创立。旦巴绕丹 1941 年出生于西藏山南地区的唐卡绘画世家，从小接受严格的传统唐卡绘画理论和技法的训练，于 2007 年被文化部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勉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他率先在自己家中开设培训班，招收有兴趣的藏族青少年作学徒，按照传统方法培养年轻一代的职业画师。同时破除唐卡技艺只在家族内部传承的陈旧观念，开创了西藏唐卡技艺从家族走向社会传承的先河。后来该校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公益培养了 500 多名来自西藏和涉藏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造就了一批十分优秀的民间唐卡艺术家，这些优秀毕业生成立自己的唐卡工作室，继续培养第三代画师。目前第二代和第三代画师已经成长起来，共同成为当代西藏唐卡勉唐画派的重要传承群体。

在传承方式上，该民间学校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同时也在积极融入现代化的新元素。例如，新入学的学徒至少要按照要求完成 6 年的学习和训练，培训时间和具体内容基本按照传统做法进行，但学徒需要通过独立绘制毕业唐卡作品来证明已达到出师的水平，完成最后的毕业考核，此处也借鉴了现代学院制。所有学徒都不用交纳任何学费，且在掌握了初步的绘画技能之后，就会获得学校发放的生活补助。随着技艺的增长，补助的金额也会不断提高，这样就极大地减轻了青少年学习期间的经济压力。这种模式的形成既与传统学徒制的影响有关，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进入相关。学校可以通过在市场上接受唐卡绘制的订单，来获取办学经费，掌握一定绘画技法的学徒可以在学习和绘画训练中协助学校完成订单，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以维持民间唐卡学校的持续运转。

该类型的民间传统技艺的职业训练看似十分传统，但打破传统做法的地方也非常多。如该校在学徒招收方面，完全突破了地域和民族身份的限制，甚至也没有国籍的限制，有来自内地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个别外国人曾在该校学习唐卡绘画。特别是学校也打破了过去只有男性可以学习唐卡绘画的限制，女性画师群体的出现成为藏族地区的一道新社会风尚。该校解决了一大批来自边远农牧区家庭子女的生计问题，他们掌握了谋生的技能，获得了实现个人发展的宝贵机会。从普通放牛娃到杰出唐卡画师的蜕变在该校屡见不鲜，其中技艺和理论水平高的画师还被各级政府评为唐卡非遗传承人。尤其是其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批毕业画师，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掌握唐卡手工技艺，而是以藏式美学和艺术理念为根基，开放

地吸收融汇东部汉族地区的宋代工笔画、山水画的审美和艺术特点，逐渐形成当代西藏多元融合的新唐卡绘画风格，正逐渐成长为能够代表当代藏族唐卡艺术水平的艺术家。

以旦巴绕丹唐卡艺术学校为代表的民间职教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核心在于充分保留了传统职业技艺传承中的有效做法，同时又能根据当下的需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利用全国的大市场来推动西藏传统职教的内生型现代化。这种来自民间自发的创新发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也为中国民族地区探索传统与现代深度结合的职教路径提供了有益经验。

2. 传统教育理念在现代职教中的创新运用

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根本是个人的现代化，个人的现代化核心在于教育，对高质量的新型教育方式的探索，是促进该目标的关键。藏族地区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是未来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必然会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如何在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理念和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当务之急。在高度同质化的教育领域，要寻找差异化的有特色的经验，就需要特别关注民办教育中的成功经验和探索。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处偏远，全州平均海拔 4300 米，自然条件严酷，经济社会发展在青海省处于末位。但正是在这样的地区，将近 30 年前诞生了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通过职教和普通教育的结合，努力探索教育现代化的可能路径。2023 年 8 月笔者对学校创始人吉美坚赞先生进行了访谈，他讲述了办学初衷：

“我们学校是 1994 年建的，明年就是 30 周年。我主要因为自己的经历才创办的学校。我自己是牧民，当时很难上学，后来有了机会上了一些学，从青海民大毕业，也去了一些寺院，学了一些传统文化，就感觉到教育太重要了。毕业后一直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是办一个学校。1994 年我办学校的时候，果洛州的入学率只有 19.6%。2002 年又开始办女子学校，女子学校办了以后，对我们当地的入学率提高了很多”。

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像吉美坚赞这类地方乡贤的作用。因为是本着个人对家乡的情怀做事，很容易探索出与众不同的新经验。如在学校选址方面，由于政府有集中办学政策，一开始不太同意在山里办学。最后吉美坚赞还是坚持把学校建在了山沟里。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农牧区的孩子离学校近一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城镇里的环境比较吵闹，对牧区的孩子影响大；山里虽然条件苦，但学习环境特别安静，不受社会影响。中国东部地区的传统教育场所——书院，也大多建在山水清幽之处，与吉美坚赞学校的选址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吉美坚赞办学 29 年的经验看，选择在山里办学，创造一个安静而不受干扰的学习环境是成功的。该校现在已经覆盖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整个学段，效果也十分显著，成为青海省民办学校中的名校。

该校和上海等省市院校进行合作，让毕业生前往东部地区深造，并在他们完成学业后招聘他们回校任职，由此形成正向反馈。吉美先生说：“我们第一届毕业班，一个学生考到黄冈中学去了，一个考到上海浦东的民办学校。上海做成了一个整体的民族班，这个班后来成了浦东的先进集体。我们的民族班一进来，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都改善了。最后我们和上海市做对口，上海当时教育厅的一个处长直接在一个教育的会上就提了，只要是果洛民族职业学校的学生，不用考试，直接可以进入。第一批是 2012 年去上海读的高中，后面读尚研究生的都有。我们老师来源是自治机招的，现在是自己学生上了大学后回来当老师，学校毕业后读到博士的已经都由好几个了，女校也有很多研究生，他们非常熟悉这里，也愿意回来”。

一所位于青藏高原最偏远的高海拔牧区的民办学校，为什么能够取得良好的办学成果？吉美坚赞认为，关键是两条原因，一是首先培养学生的道德文化素质，二是借鉴藏族传统大五明文化中因明学的逻辑思辨方法。

道德教育方面，学校按照藏族传统教育文化的观念，积极吸收汉族地区的传统经验，主要先教做人，再教其他方面的知识，包括将《三字经》等翻译成藏文来教学生，促使学生进

入社会后在道德上能得到非常高的认可，间接导致学校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被其他学校开除的问题学生在进入该校后，通过教育实现了良好的转变。

逻辑学训练方面，该校最早探索了用的是因明学的辩论方法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促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很显著提升，尤其是学生的辩论能力非常强。从该校走出来的学生，曾获得2012年全国辩论比赛研究生辩论的第一名，高中生辩论赛的前三名也是该学校毕业生包揽的。后来青海省有些中学也尝试学习这种方法，当然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吉美先生解释道：“有很多人认为，你这个是学习宗教的做法开设了因明学的课，对我们有很多刻板印象，觉得这个和宗教相关，还是有一点偏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说的是辩论的教学模式，学的是怎么去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学习因明学，把这个方法拿出来学习物理化学甚至诗歌都可以。现在传统文化和教育结合很难，我们做到了。”

教育的中国式现代化，一条重要的出路在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方法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该领域发展目前仍十分滞后，不妨多鼓励来自民间的探索和创新。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通过探索道德教育和逻辑思辨教育获得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办学29年来从来没有发布过招生简章，生源一直非常充足，家长需要提前一年给孩子报名。对于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的职业去向，吉美坚赞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青年不创业的话，我们国家怎么去发展？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回来了以后，一直等着，特别是在青海都等着考公务员，我们什么时候能发展？我认为毕业生应该要创业。我们国家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比如创业的支持力度一直在加大，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如果社会上创业能打造起来，公务员就不会拥挤了，国家对包括社会力量这些要支持，要包容，要给他们一个发展的空间。”

青年一代通过创新创业来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是国家的希望所在，没有青年创造精神的发挥，现代化就后继无人。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提升各族青年创新创业的能力，就是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探索重要的出路。当然，这种探索是由各民族共同来实现的，因此在教育领域，必然需要有民族团结教育。吉美坚赞指出该校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做法：“我们学校提民族团结口号提得少，没张贴一张标语，但是实际却做得很好。我这样看民族团结，作为藏族把汉族的传统文化学好，这是内在的团结，我们就是让藏族学生学习好汉族的传统文化。”

该校一直注重通过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来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开阔学生的眼界和认知，增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深层了解。现在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仍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的一个症结就出在教育领域。教育的现代化是国之大学，在全国教育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以吉美坚赞学校为代表的来自青藏高原地区的探索，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只要不断鼓励探索，总结经验，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面对，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就能取得日积月累的进步。

3. 手工艺领域少数民族专业人才的跨文化培养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近些年通过重点聚焦文化发展，进而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探索出了很独特的发展路径。特别是该州的壤塘县，由当地社会发展力量引领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与传统职教的现代化，当地政府全力支持协同，逐步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可持续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进步的正向激励。壤塘县的经验广受关注，发展的层次和质量非常高，对民族地区现代化路径的思考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壤塘县位于阿坝州西北部，传统上属于阿坝州各县中最偏远贫困的县，既没有支撑性的传统产业，也缺乏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区，发展十分困难。当地的优势是位于康巴、安多和嘉绒三大文化区的交汇处，传统文化和手工艺发达。特别是其中的中壤塘镇，是藏传佛教觉囊派壤塘三大寺（卻尔基寺、泽布基寺、藏哇寺）的所在地，觉囊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一个古老的派别，起源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一条名叫觉囊的山谷，大约在十三世纪晚期就有高僧在此修建了觉囊寺。到了十四世纪末，有高僧赴西藏觉囊寺学经

后返回壤塘弘法，从此将觉囊教法传播到了阿坝壤塘地区¹。随着觉囊派的传入，该地区具有觉囊派风格的梵乐、唐卡绘画、各类手工艺等不断发展并沿袭至今。

在充分考虑壤塘县资源禀赋优劣势的情况下，当代藏哇寺的著名宗教人士健阳乐住任波切（又名嘉阳乐住）于2010年在中壤塘镇建立壤巴拉非遗传习所，并不断发展壮大。健阳乐住先生1974年出生，2012年被文化部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佛教音乐觉囊梵音）代表性传承人²，同年被评为四川省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2017年，该所建立了壤塘县巴拉非遗传习协会，负责官吏辖下各个非遗传习所。截止2023年，该所之下已建有17个门类的非遗传习分支机构，有各类学生和毕业生500多人，涵盖唐卡、觉囊梵乐、藏香、藏医药、藏毯、雕塑、藏装、缙丝、刺绣、堆绣、陶瓷、藏茶、藏式护肤品、藏药浴、瓷板画、擦擦、藏纸等各门类传统技艺的传承和教学。

当地州县政府全力支持非遗传习和文化产业扶贫工作，对口支援的壤塘县的浙江省温州市也积极参与其中并支援2850万元（人民币），共同在中壤塘镇里为传习所投资建设了占地8.3万平方米的浙川文化产业园，“着力打造以非遗文化传承和创作为核心，集对外分享展示、文化艺术学术交流和艺术品线上线下流通、特色文化原乡居旅游体验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区，包括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传习中心、村民活动中心、非遗展示中心、非遗交流中心4个中心³。2019年该园区投入使用，园区的传习空间、展示空间、生产空间和手工艺人的住宿空间都由政府免费提供，极大改善了该所的硬件环境，同时还便于当地的年轻人就近在传习园区学习和就业。壤巴拉非遗传习所的职业技能传授教育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手工艺门类的跨界，打破过去民族文化的边界，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就注重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熏陶。如鼓励藏族学生临摹宋代江南绘画，将唐卡绘画和宋代绘画风格进行融合创新；将藏医传承和传统的中医、道医结合，进行一体化学习；目前正在探索将唐卡绘画技艺用于景德镇瓷器绘画上，将藏式陶艺和宜兴紫砂技艺进行融合等，呈现出各民族非遗手工跨界融合的特征。

二是非遗传习教育中地域空间的跨界，推动非遗传习走出去，结合国家对口支援机制，在东、中部地区设立了20个飞地型传习基地，成为跨民族非遗传承的载体和平台。位于上海市金泽镇的金泽工艺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当地培养出一大批唐卡等藏族非遗手工艺的优异人才。

三是非遗传统技艺传授和现代技术学习的跨界，如传习所正在培训唐卡画师学习电脑动画的绘制技艺，计划将唐卡绘画技艺与动画片结合，创作格萨尔王（古代藏族人民的英雄）等主题的一系列动画片。

四是非遗传习机构与学术研究界的跨界，该所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多次召开研讨会，对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涉及的哲学、思想、艺术、美学及经济社会价值等进行研讨，组织实地考察，邀请高校著名教授为非遗传承学徒开设讲座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手艺人对此反应很积极。

在整个阿坝州的非遗手工传承教育和发展领域，业内人士一致公认壤塘县是做得最出色的。通过政府支持，目前全县有非遗传习所42个，从业人员和学徒达到3000多人，文化扶贫成效十分显著。调研中遇到的女唐卡画师卓姆措是中壤塘镇人，1999年出生，卓姆措讲述：“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需要人干活，12岁时帮家里放牛。有一天我的奶奶出去时，听说了壤巴拉非遗传习所招收唐卡学徒，问我想不想去学，我想去，就到传习所学习唐卡绘画。一直学了7年，很艰苦的，前些年就毕业了。现在已经结婚成家，丈夫也是非遗传习所的毕

¹ 王怡潇，“觉囊派历史与艺术源流考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77-185页。

²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www.ihchina.cn/representative.html

³ 杨骁，“深化对口支援，共叙山海深情——浙江省对口支援壤塘县浙川文化产业园见闻”，《阿坝日报》2022年8月23日，第1版。

业生，我们都在非遗传习所工作。像我们这样的夫妻在传习所里还挺多的。”从放牛娃成长为优秀唐卡画师，短短几年经历的人生蜕变，很好地诠释了适应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现代化职教和新兴发展方式。卓姆措曾与其他画师合作绘制的一幅大型唐卡，曾被国内一位收藏家以300万元的价格收藏。像卓姆措这样的例子在传习所并不鲜见。

壤巴拉非遗传习所毕业的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出去独立发展，也可以留所就业。“在读学员2至3年的学艺期间，能领到月均500元的生活补助，学员作品销售收益60%归学员所有，40%纳入生活补贴及园区运营管理”¹。由于所内工作条件好，目前毕业的学生90%都自愿选择留在传习所工作。培养出来的传习所各类管理人员也达上百名，并成为运营、维系该所是中坚力量。毕业生如今大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方便这些父母工作，传习所专门建立了幼儿园，所内手艺人下一代子女得以就近入园接受教育。随着在东部地区飞地传习基地的建立，如今手艺人已走出壤塘，到东部各省发展。

壤塘县政府将“文化强县”列为发展战略，尽力为手艺人的居住、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尽可能解决遇到的困难，受到当地非遗传承人和手艺人的普遍称赞。2023年9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对口支援壤塘县工作队的支持下，壤巴拉非遗传习所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举办了“藏风宋韵——壤巴拉非遗艺术展”和非遗大讲堂，反映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精美手工艺品和唐卡等艺术品受到杭州市民的热烈欢迎²。这种民间职教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发展领域，具有很深层次的价值启发。

壤塘的经验探索，显示出贫困民族地区通过发挥民办职教的力量助推内生型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注重青少年神父教育的力量，传习所的实践可谓具有一定教育试验性质的发展探索。在职教领域的具体经验上，一是深入挖掘传统学习方法的力量，注重对学生专注力与内心力量的重视和开发，形成非常沉浸和投入的学习状态，产生了十分高效的学习效果。藏族青少年的高度专注保证了高效的手工技艺学习的高效率，挖掘出学生在艺术和审美上的敏锐性、独特性，也提高了其艺术品的独特审美价值。二是尽可能提供高水平的教育资源，试图为藏族贫困青少年铺就手工艺大师养成之路，可以看到在具备理想的教育条件时，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三是特别注重挖掘跨界教育的力量，打破了汉藏民族文化的边界，跨族群文化交流在艺术和审美的深层次上发生了碰撞融合，促进了民族间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壤塘的发展实践，既是青藏高原地区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典型范例，也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落实的代表性个案。

发展和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个人对发展和现代化的认识、支持和推动，其中最关键的是教育。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事实上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需求，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教育理念革新的重要价值。以壤巴拉非遗传习所下设的唐卡传习所学生为例，不仅学习唐卡绘画技艺，还通过博物馆得到美学教育的浸润式熏陶；反复临摹宋代工笔画，接续了历史上汉藏绘画艺术交流的传统，实现了汉藏艺术与美学的交融碰撞，再通过与高校教育资源对接，努力营造出艺术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该传习所的职教实践表明，即便是常规学业表现较差的藏族学生，只要通过合适的自信教育和专注力与内心力量的发掘，就能够产生十分积极的教育效果。这种教育回归本质的理念革新，不仅在民族地区的职教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具备可借鉴的价值，对整个国家的职教都具有启发意义。

4. 农牧区少数民族青年的科技应用能力教育

在一些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程度高的地区，当地民众的国家通用语文使用能力较低，少数民族语文使用较为普遍，如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很多农牧区就非常典型。在此情况下，因

¹ 杨骁，“深化对口支援，共叙山海深情——浙江省对口支援壤塘县浙川文化产业园见闻”，《阿坝日报》2022年8月23日，第4版。

² “西子湖畔的藏地神奇，去恒庐感受来自壤巴拉的敬畏与极致”（2023年9月28日）腾讯新闻网，<https://news.qq.com/rain/a/20230928A0A0FL00>

语言能力差异而失去就读公立大学机会的藏族青年，特别需要民间职业学校来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尤其是希望学习计算机科学等高层次专业人才。

洛藏科技职业技术学校（洛藏职校）成立于2015年，由洛藏先生创办。洛藏是出生于青海省海南州的藏族人士，拥有博士学位，曾是西藏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他在2015年左右辞职回家乡后创办了以计算机专业为特色的职业学校并任校长。该校规模不大，但截至2023年已设立了中专、大专和本科专业学位，其中中专是计算机技术专业，大专是计算机应用技术（藏文计算机方向）专业，本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专从2016年开始招生，笔者访问该校期间，在校的学生全是大专、本科学生，中专于2023年9月首批开始招生。洛藏校长说：“我们学校2018年首届学生毕业了17个人，2021年有10个人回来感恩母校。当时有的学生就哭了，因为有了洛藏职校他们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大学这些学校，如果国家通用语分数达不到就进不去，我们这个学校有国家制定的特殊政策。这几年国家对我们的政策更优惠了，原来我们分数线都在100分以上，但是这两年，国家说要培养本地的信息化人才，所以把分数定到了90分，实际真正的分数是70分，因为有20分是少数民族加分。”

洛藏职校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办下去，与青海省农牧区的实际需求有关，洛藏校长解释道：“民族地区的计算机技术真的很落后。我是共和县出生的，父母是牧民，我在西藏大学里当老师的时候，回到家乡时，人们经常问我教什么，我说教计算机，他们根本都听不懂。内地的计算机技术，这两年已经没有问题了。比如说西宁的一些职校里，计算机专业都已经饱和了，计算机学完出去不吃香，因为大家都会。但在农牧区，大家还是不会。”

洛藏职校的成功开办也与国家近些年的政策支持分不开。由于职教在国家视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为民族地区民办职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大量中专毕业生也迫切需要有一个进一步深造的通道，渴望读大专。洛藏感叹道：“教育厅真的很支持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很感动。我原来都不知道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们参与进来以后才发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真的很多。这两年学生越来越多，我们王校长说，‘这些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父母没受过教育，没有能力让孩子学好汉语，没这个意识，也没有经济能力。孩子生在哪里就在哪里长大，没办法学到汉语，就考不上学，他们就只能在这个社会上流浪。现在有了这个职业学校，他们就可以来上学。’我们这两年招生挺好，每年都是三十多名，学生大多来自民族地区的中等职校。”

民办职校的优势在于灵活，能根据一个特定区域的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来设置专业，尽管规模可能很微小，但培养的都是实用型人才，能够切合农牧区基层发展。洛藏认为，目前各个大学都没有藏文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洛藏职校开设了以后，对满足农牧区的发展需求特别有用。特别是洛藏职校支持建立的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园里，有很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他们特别欢迎职校的毕业生。随着藏族地区的不断现代化，人们对科技的兴趣越来越大。曾有学生在西北民族大学读完其他专业的大专以后，又来洛藏职校读计算机的大专，说明人们感觉到了科技的重要性。洛藏职校现有的3个创业孵化园里，有八十多家小微企业，包括很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他们特别欢迎职校的毕业生，职校也一直引导他们走农牧业现代化之路，积极嫁接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随着藏族地区的不断现代化，人们对科技的兴趣越来越大。曾有学生在西北民族大学读完其他专业的大专以后，又来洛藏职校读计算机的大专，说明人们感觉到了科技的重要性。洛藏职校目前只有计算机一个专业，也需要有新的专业拓展，该校正在筹划开设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洛藏职校的存在与当地藏族中专业毕业生的语言能力密切相关，正是因为国家通用语文的普及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给洛藏职校提供了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洛藏校长提到：“我们也有点担忧未来的生源问题。后面的年轻人汉语可能会越来越好，也许他们就不太需要学藏文计算机方向。但是现在的生源还是特别充足。国家对高职的计划招生，就是中专毕业后上

大专的，只招 60% 的学生，剩下的 40% 就没地方去，只能在社会上待着。我们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这些学生很多都听不懂汉语，大专毕业后也考不上本科。我们做本科教育也是想通过我们的双语服务来提升一下这些学生。我们本科的学生是通过双语来教学的，学生们过来读计算机专业，不懂的地方可以用藏语来解释，他们用纯汉语学习还是拿不下来。我们现在向国家申请的是用汉语教课，考试也是用汉语，但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用双语教学，学生学起来就特别方便”。

这种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配置教学语言的做法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语言除了具备交流工具的价值，也拥有情感和认同的价值，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处理好两类价值的关系十分重要，洛藏校长对此深有体会：“我们有一次拿着一个自己开发的藏文点读笔电子产品，参加科技部的创新创业大赛，得了一等奖。我们到家乡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信，连大学生们都不相信。我们在朋友圈子里去讲的时候，他们都说，‘国家级（奖项）里面还能有藏文的一分子啊？’我说，‘有啊，国家专利里有藏文的产品。’我们 2016 年去苏州比赛，评我们那个产品的时候，评委全是不懂藏文的，但是这个产品里面藏文、汉文、英文都有，就给了优秀企业奖。我们回来就说，‘你看，在国家的体系里，每个民族的机会都有。我们只是没有去争取，我们没有举手。’我们获奖以后，学生们就觉得，‘哦，国家的专利里面可以有藏文，国家的奖项里面可以有藏文，国家的教育里面也可以用藏文来讲计算机。’我们参与了才知道，原来国家体系里都有，只是我们没去弄，所以一定要学习国家的政策。”

民族地区的民办职业学校不光有职教，由于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认同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方面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方法。如洛藏校长就曾做过相关的探索：“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出去的时候还是很了解国家政策。我们还做过这样的探索，去年（2022 年）我说你们是做信息化的嘛，让学生们去了解一下藏文网站的运营情况。他们了解过了之后发现，藏文网站基本上 90% 都是国家的资金在支持，我说，‘你们以前有没有感恩过国家？没有国家的资金，藏文网站都做不起来’。学生们这么做了以后就知道了，小小的一个藏文网站，原来可能民间的也多，但是民间的不可持续，但是国家支持的就一直在。我们这么做了以后，学生就知道人民网、新华网都有藏文，这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作用。我就说：‘我们走的是有民族特色的路，但是不能伤害这个国家，一定要支持这个国家’，就这样做的。这种活动公办的（职校）也没办法安排，但是我们民办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样民办的机构多一点，有可能是不是更好一些，因为它灵活嘛。”

洛教职校只是青藏高原地区众多民办职校中的一个例子，但是能够很生动地揭示民办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独特优势。特别是不能因为学校规模的微小而忽视其存在的价值，众多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小型民办职校汇聚在一起，也能迸发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正能量。尤其是这类民间教育实践中所孕育的智慧、价值和经验，往往更加宝贵，值得整个民族地区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收借鉴。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办职业教育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内外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显示，以新兴科技和生产力的产业竞争态势愈发明显，东部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在经济发展全局中所占据的位置将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只有规避发展劣势，另辟蹊径，充分发挥该区域的内生性力量和灵活性优势，形成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不对称的发展优势，并通过职教给新一代少数民族青年的人力资源充分赋能，再经由向区域外转移及区域内就地转移就业，实现畅通的社会流动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藏族地区民间的职

业教育探索的价值，事实上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在微观层面具备了推动社会良性发育的重要功能。这是我们今天关注民族地区民办职业教育的初衷所在。

展望未来，随着民间职业教育探索及其价值被越来越多地发现，将来必定会涌现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和启发性的个案。当然，上述案例已经启发我们，当前亟待构建民间与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民族地区民间职校与东、中部地区职校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形成多方合力，增进彼此了解。笔者认为后续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民办职教深明民间探索创新之道，可进一步激发少数民族青年的潜力与活力。过去十几年，藏族地区民办职业教育更多地以自发创办为主，来自政府的支持在逐步增加，但仍然远远不够。未来应该从促进民族地区长远发展的角度，给予更大力度的鼓励和支持，为民办职业教育提供更加制度化的、有弹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针对众多民间小规模、非正式的作坊类职业技能传承机构，在注册登记备案和日常管理方面做出变通安排，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同时避免过多微观层面的干预。对职业技能传授和职业人才培养绩效良好的民间机构，应当给予积极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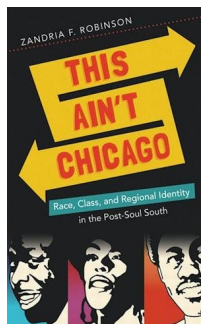
第二，民办职教与公办职教可进行深度合作并打通制度化渠道。在西藏和青海等地的民办和公办职校，已有一些探索性的合作经验，特别是中职校吸收民间非遗传承人来当授课教师，并取得较多积极反响。但由于大量民间机构在制度化和正规化方面与公办职校差异非常大，导致双方的合作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未来在政府支持下，一方面应该提升民间职校的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因地制宜，建立多样化的合作渠道，在生源、师资、课程、实习等方面实现互通有无，在职业人才培养理念方面开展深度交流，共享职业教育发展资源，形成双赢格局。

第三，建立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职业教育的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机制。民族地区民办职业教育的优势在于植根于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经验成熟，学生培养机制灵活，培养效果好，可以与东、中部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优势互补。通过国家已有的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机制，持续推进东西部民办职业教育的深度交流合作，不仅能够实现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还有利于各族青年学生和教师之间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构筑更加和谐包容的民族关系，不断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认同意识。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65 期

《这里不是芝加哥：后灵魂时代南方的种族、阶级与区域身份》

赞德里亚·罗宾逊（Zandria Robinson）著，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4 年



书籍简介：当赞德里亚·罗宾逊（Zandria Robinson）回到家乡孟菲斯采访非裔美国人时，常常会听到一种警告：“我希望你知道这里不是芝加哥。”在本书中，罗宾逊批判了通过北方视角构建的黑人身份理念，并将非裔美国人视为当代南方文化的重要塑造者。她分析

性地将南方黑人与他们的移民表亲、虚构亲属和白人同胞分开，展示了地区如何与种族、阶级、性别和区域身份及差异交织。

罗宾逊将她的研究扎根于孟菲斯——从密西西比三角洲向北走的第一个大城市。尽管孟菲斯揭示了关于南方的很多事情，罗宾逊并不认为该地区是完全统一的。相反，她关注多元化的南方，并注意南方地区之间的区别。孟菲斯既不是旧南方，也不是新南方，它位于农村与城市、灵魂与后灵魂、公民权利与后公民权利的交汇处，代表着与南方过去和现在各种化身的持续对话。

本书获得了社会问题研究学会种族与族裔少数群体分会的爱德华多·博尼利亚-席尔瓦图书奖（Eduardo Bonilla-Silva Book Award,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Division on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作者简介：赞德里亚·罗宾逊（Zandria Robinson）是罗德学院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她是《重新定位种族：后种族奥巴马时代的预言研究》一书的联名主编。

书籍介绍：1903年，W.E.B.杜波依斯（Du Bois）的《黑人的灵魂》首次提出了美国黑人种族身份的问题。他认为，黑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要求非裔美国人在自我展示与满足白人社会和黑人社区期望之间取得平衡。几十年后，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等其他活动家、艺术家和学者进一步解构了黑人身份的形成及其他因社会阶级、性别和性取向而产生的身份矛盾的影响。这些学者都挑战了同质化的黑人身份的概念，质疑什么是真正的黑人身份，更重要的是，交织的现实如何复杂化了美国结构性特权和压迫的普遍化。

在《这里不是芝加哥》中，赞德里亚·罗宾逊将这一讨论带入二十一世纪的语境，重点关注非裔美国人在后种族、后公民权利的美国南方如何显形和生活。这部著作批判了常用来理解黑人身份的北方和城市化的视角，并展示了地区、种族、社会阶级和性别的交叉如何影响当今的黑人身份。罗宾逊将她在田纳西州孟菲斯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与这一关于黑人身份的讨论结合起来，在孟菲斯，她的受访者认为孟菲斯往往比芝加哥更真实地代表黑人身份。罗宾逊从五年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媒体分析中提取的丰富数据，成功地解决了更广泛的问题，例如区域和种族身份在媒体中如何呈现，以及这些描绘是否实际上用于她称之为“后灵魂”黑人在新南方地区的日常经验中。可以说，《这里不是芝加哥》是一部元民族志（meta-ethnography），它的信息来源和对其的解释增添了广度和深度，这是通常较小范围的项目难以处理的内容。

《这里不是芝加哥》的第一章首先界定了“黑人南方（Black South）”及其在二十一世纪日益成长的身份。她的材料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学术讨论、卖座影片、著名作家和表演者（包括说唱艺术家），它们展示了与南方黑人身份有关的常见谜团和当下叙述。罗宾逊为读者清楚建立了世界如何看待黑人的视角，以此开始解释区域化和种族化的重要性。

第二章提出了更重要的理论主题之一，即解释她称之为“乡村世界主义（country cosmopolitanism）”的南方黑人身份。这一概念指出了黑人身份及其在美国南方形成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这与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概念相呼应。罗宾逊指出，受访者认为在孟菲斯和其他后公民权利时代南方城市和农村地区长大的黑人，发展出了一种更真实（authentic）的黑人身份。此外，这种身份来自于在面对仍然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时，深南部农村传统和城市化模式的结合。罗宾逊很好地描述和解释了农村与城市的复杂性，以及这种看似统一的黑人身份的碎片化如何未在公共话语或梅森-迪克森线以北显现出来。

第三至第五章尤其适合对交叉性如何形成美国身份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阅读。在第三章中，罗宾逊展示了即使在所谓的合法种族歧视结束后，种族和种族主义在孟菲斯及整个南方塑造黑人身份观念的持久力量。第四章探讨了乡村世界主义和区域性如何塑造性别规范和角

色。有趣的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传统的融合，传统性别角色和行为得到了重新确认。最后，第五章关注了地区、社会阶级和出生地在塑造黑人身份中的交叉，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产阶级黑人在南方如何互动，以及阶级如何继续在政治上将他们分裂。

本书的优势在于其对南方黑人身份的详尽解释和复杂化。罗宾逊巧妙地展示了种族、阶级、性别和更为重要的地区在黑人身份讨论中的重要交叉点，她在受访者的生活经历和流行文化作品之间游刃有余地进行解读与分析的能力，证明她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也是一位言简意赅的作者。对于任何对身份与地点、种族与地区以及方法与解释之间的各种交叉点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本书十分值得阅读。

本文采编整理自：

Lippard, C. D. 2015. This ain't Chicago: race, class, and reg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soul South.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8, Page2450-2452

Borer, M. I. 2015. Book Review: This Ain't Chicago: Race, Class, and Reg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Soul South. *City & Community* Vol.14 Page87-89

延伸阅读：

Hunter, M. A., & Robinson, Z. 2018. *Chocolate cities: The Black map of American lif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巧克力城市：美国生活的黑人地图

Lacy, K. R. 2007. *Blue-chip black: Race, class, and status in 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一流黑人：新黑人中产阶级中的种族、阶级与地位

Johnson, E. P. 2011. *Sweet tea: Black gay men of the south*.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甜茶：南方的同性恋黑人

Rushing, W. 2009. *Memphis and the paradox of place: Glob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孟菲斯与地区悖论：美国南方的全球化

(编译：廖敬霖，责编：阿嘎佐诗，排版：胡琼)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66 期

《新俄罗斯民族主义：2000-2015 年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

帕尔·科尔斯特（Pål Kolstø）、海尔格·布拉基斯鲁德（Helge Blakkisrud）主编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书籍简介：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之前主要被“帝国”倾向所主导，这种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一个辽阔、强大、多民族国家的自豪感，并且这种影响力还投射到了领土以外的地方——但是当代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关注民族问题。自从 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在乌克兰东部爆发暴力冲突以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话语发生了一系列转变。

本书由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研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学者共同撰写，特别关注了 21 世纪初至 2015 年间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变化，内容包括对仇外症的案例研究；民族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媒体中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普京政权的民族主义策略，以及对公众舆论中民族主义的分析。

作者简介：帕尔·科尔斯特（Pål Kolstø）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俄罗斯和后苏联研究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西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关系、民族主义和宗教。

海尔格·布拉基斯鲁德（Helge Blakkisrud）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俄罗斯研究副教授，也是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俄罗斯联邦的中区关系以及欧亚大陆的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

书籍介绍：普京领导下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吸引了大量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在众多相同议题的讨论中，本书特别关注了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向民族化的“新”帝国主义转向，书中的文章分别由六个不同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最著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研究者撰写。当然，把研究背景不同的学者撰写的不同文章合辑出版并不容易，但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复杂、多面的现象，本身也值得从多个角度进行，多样性的视角恰恰构成了本书的一大优势。本书的大部分实证分析基于 Romir 在乌克兰事件发生后于2013年5月和2014年11月进行的两次全国调查，除此之外，本书编者也参考了大量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

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侧重于社会层面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第1-7章），一部分侧重于国家层面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第8-12章）。尽管从这本书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新”，但作者们清楚这种民族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几章表明，今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历史变迁和例如苏联解体、非俄罗斯移民大规模涌入等事态发展的产物。

第1章指出了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重要差异。Pål Kolstø追溯了他所说的俄罗斯“族裔核心民族主义（ethnic core nationalism）”的演变，将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出现描述为俄罗斯联邦取代苏联的结果。

在第2章中，Emil Pain 追溯了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帝国的国家观念已经取代了国家民主党人（national democrats）和 Konstantin Krylov 所倡导的更加民族同质化和民主的国家观念。

Alexander Verkhovskiy 在第3章中指出，克里姆林宫的乌克兰政策分裂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第97-100页），一些人支持独立广场革命（Maidan revolution），希望将其带回莫斯科，另一些人站在分裂分子的那一边离开了俄罗斯。但是他也警示大家，指出激进民族主义团体构成的威胁只是暂时减少了。

Anastasia Mitrofanova 的第4章和 Natalya Kosmerskaya, Igor Savin 的第5章分别为解释民族主义与宗教的联系和莫斯科居民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第6章是 Mikhail Alexseev 关于俄罗斯非少数民族对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他认为他们的争论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普京打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前苏联领土上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太可能疏远相当数量的俄罗斯少数民族”（第18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暂时没有证据表明需要担忧给予克里米亚人表面上的自决权是否会导致车臣相应的民众要求。

如果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立即收集更多的数据，那么由 Alexseev 和 Henry Hale 共同撰写的第7章可能是本书中最精彩的一章。这一章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对2014年的重大事件进行了重要的批判性解读。作者发现吞并并没有使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变得激进，“民族自豪感和仇外心理的模式变化相对较小”（第216页）。然而近来普京愿意公开支持这些民族主义事业。两位作者一致认为普京改变国际立场是出于对国内情况的考虑，这次吞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转移理论相一致”（第217页）。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和推进与俄罗斯其他政治事务有关的争论，包括那些关于克里米亚危机是由北约扩张还是由于俄罗斯内部事态发展推动的辩论；同时还能进一步探究俄罗斯政权的性质。

第 8 章紧紧抓住了本书后半部分的主题。在早期工作的基础上，Hale 呈现了民族主义如何成为普京在 2014 年发起的“家长式总统”的合法化口头禅。

Helge Blakkisrud 的第 9 章通过论证 Russki 和 Rossianie 的方法，对 Pain 的第 2 章进行了补充，这两个概念经常被翻译为俄罗斯民族（nation）的族群（ethnic）和公民（civic）概念。这一发现的关键含义，以及在本书的塔林首发会上经常被提及的是：普京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对俄罗斯立法者的演讲中使用了 Russki 一词，它可能并不像最初看上去那么重要。

在第 10 章中，Marlene Laruelle 讲述了俄罗斯如何“将自己定义为另一个欧洲，这使得拒绝西方自由主义的同时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欧洲成为可能”（第 295 页）。俄罗斯最近立法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强化了俄罗斯与西方存在文明鸿沟的刻板印象，比如俄罗斯最近有关家庭暴力不属于非法的提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 11 章介绍了 Stephen Hutchings 和 Vera Tolz 对于克里米亚危机的电视叙事分析，揭示了“一个极度不安全的政权”（第 332 页）。Peter Rutland 在第 12 章分析了经济学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观念中的地位。

多种视角和大量涵盖的材料使这本书成为任何对克里米亚吞并前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作。

本文采编整理自：

- Pål Kolstø, Helge Blakkisrud (Editors). 2016.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000-2015"*.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 Arnold. 2017. Reviewed Work(s):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000-2015* by Pål Kolstø and Helge Blakkisrud. *Europe-Asia Studies*, Vol.69(5):847-849.
- Elizaveta Gaufran. 2017. Book Reviews: Pål Kolstø and Helge Blakkisrud (eds.),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000-15*.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23(3): 652-654.
- Cheng Chen. 2018.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000-15*. Ed. Pål Kolstø and Helge Blakkisrud. *Slavic Review*, Vol.77(2): 556-558.

延伸阅读：

- Simon Franklin, Emma Widdis (Editors). 2004.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文化中的民族认同
- Nicholas V. Riasanovsky. 2005. *Russian Identities: A Historical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身份：一个历史调查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编译：谢小雨，责编：阿嘎佐诗，排版：胡琼）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413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hehui.pku.edu.cn/second/index.aspx?nodeid=1820>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